



# 艰难时世：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男性气质与性别暴力



## 艰难时世：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男性气质与性别暴力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出版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3版权所有  
封面设计：北京瀚祥瑞晟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是国内一流的公共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研究型学院。

联合国人口基金作为一个国际发展机构，致力于让每一次怀孕都合乎意愿，确保每一次分娩都安全无恙，让每一位青年人的潜力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预防伙伴 (Partners for Prevention) 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共同展开的针对性别暴力预防的亚太地区联合项目。

本报告得到了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但此报告的内容和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人口基金致力于：**

在这个世界实现每一次怀孕都合乎意愿，

每一次分娩都安全无恙，

每一个青年的潜能都充分实现。

**联合国人口基金 — 因为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UNFPA,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works to deliver a world where every  
pregnancy is wanted, every childbirth is safe,  
and every young person's potential is fulfilled.

**UNFPA – Because everyone counts.**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

北京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人员办公大楼 1 单元 161，邮编 100600

电话（Tel）：+ 86 – 10 – 65320506

传真（Fax）：+ 86 – 10 – 65322510

电邮（Email）：China.Office@unfpa.org



# 艰难时世：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男性气质 与性别暴力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王曦影博士  
乔东平博士  
杨力超博士

釜山国立大学全球研究部  
Daniel NEHRING 博士

董晓珺  
皮兴灿  
王晨阳



# 目 录

序言 .....	I
致谢 .....	II
摘要 .....	III
第一章：研究概况 .....	1
1.1 背景 .....	1
1.2 概念框架 .....	1
1.3 男性气质 .....	1
1.4 生态学框架 .....	2
1.5 中国性别暴力 .....	2
1.6 历史与社会情境 .....	3
1.7 立法与女性参与 .....	3
1.8 研究目标 .....	3
第二章：研究方法 .....	5
2.1 生活史访谈 .....	5
2.2 抽样 .....	5
2.3 资料收集 .....	5
2.4 伦理和安全 .....	5
2.5 样本特征 .....	6
2.6 资料分析 .....	6
第三章：童年 .....	7
案例研究 .....	7
3.1 性别平等男 .....	8
3.1.1 具有新特点的传统家庭 .....	8
3.1.2 原生家庭的家庭暴力 .....	8
3.1.3 重男轻女和体罚 .....	8
3.2 施虐男性 .....	9
3.2.1 “男主外，女主内” .....	9
3.2.2 “家庭暴力没什么大不了” .....	9
3.2.3 “棍棒出孝子， 不打不成才” .....	9
3.3 受虐妇女 .....	10
3.3.1 原生家庭特征 .....	10

3.3.2 女孩的不公平待遇 .....	10
3.3.3 童年所经历的暴力 .....	11
3.4 讨论 .....	11

## 第四章：学校 .....12

案例研究 .....	12
4.1 性别平等男 .....	13
4.1.1 学业良好 .....	13
4.1.2 复杂的师生关系 .....	13
4.2 施虐男性 .....	13
4.2.1 老师、学生和学业成绩 .....	13
4.2.2 校园暴力 .....	14
4.3 受虐妇女 .....	14
4.3.1 师生关系和校园暴力 .....	14
4.4 讨论 .....	14

## 第五章：工作 .....16

案例研究 .....	16
5.1 性别平等男 .....	17
5.1.1 使命、成就感和优势 .....	17
5.1.2 压力、挑战和困难 .....	17
5.2 施虐男性 .....	18
5.2.1 暴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	18
5.2.2 工作、娱乐和家庭冲突 .....	18
5.3 受虐妇女 .....	19
5.3.1 走上工作岗位 .....	19
5.3.2 性别歧视下的努力工作 .....	19
5.3.3 “肩负双重负担的铁姑娘” .....	19
5.4 讨论 .....	20

## 第六章：亲密关系和性别暴力 .....21

案例研究 .....	21
6.1 性别平等男 .....	22
6.1.1 平等、合作的亲密关系 .....	22
6.1.2 夫妻间的冲突 .....	22
6.2 男性施暴者 .....	22
6.2.1 家庭权力关系 .....	22
6.2.2 暴力起因和暴力类型 .....	23
6.2.3 应对暴力策略 .....	23



6.3 受虐妇女 .....	24
6.3.1 暴力类型 .....	24
6.3.2 权力斗争和日常冲突 .....	24
6.3.3 暴力应对策略 .....	25
6.4 讨论 .....	25
<b>第七章：社会性别规范与暴力应对的社区话语 .....</b>	<b>27</b>
案例研究 .....	27
7.1 性别平等男 .....	28
7.1.1 人人性别平等 .....	28
7.1.2 好男人应该尊重女性 .....	28
7.1.3 性别觉醒的根源 .....	28
7.2 施虐男性 .....	29
7.2.1 性别平等：现实还是幻想？ .....	29
7.2.2 知行不一 .....	29
7.3 受虐妇女 .....	29
7.3.1 理想的男性和女性 .....	29
7.3.2 “针对女性的暴力是犯罪” .....	30
7.4 讨论 .....	30
<b>第八章： 总结和建议 .....</b>	<b>32</b>
8.1 总结 .....	32
8.2 建议 .....	32
<b>参考文献 .....</b>	<b>35</b>

# 序言

今年3月，在第57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上，各成员国再次对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做出了承诺，但世界上依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女性遭受着身体、情感和语言上的暴力。她们被剥夺了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权利，这对她们的健康和幸福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一直以来，联合国人口基金都是消除全世界范围内针对女性与女童的暴力的先锋力量。在第14个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国际日，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巴巴通德·奥索蒂梅欣博士再次确定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对防止一切形式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承诺，并强调了让男人与男孩参与到这一以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为理念的巨大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

性别暴力植根于性别歧视与不平等。来自全球的证据已经证明，男性是主要的施暴者，但人们对男性的施暴行为缺乏足够的了解。目前，以男性气质为切入点的关于性别暴力的研究还相当缺乏。此项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预防伙伴（Partners for Prevention）支持的定性研究是联合国在亚太地区开展的关于性别暴力的研究“联合国关于男性与暴力的多国研究”的一部分。此研究旨在了解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概念与性别暴力的发生之间的关联。这一定性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补充了定量研究的数据发现，推动以实证为依据的有效的项目干预和社会倡导以及消除中国的性别暴力。

报告中的生活史访谈的案例展示了各种多元的男性气质。这些多种多样的男性气质证明了性别规范并不是静止僵化的，它可以被改变，因此，暴力也是可以防止的。深入的生活史访谈为我们了解性别暴力的根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崭新的视角，让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性别暴力，倡导性别公平的男性气质。

性别平等的实现不能缺少男人和男孩的参与。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将与联合国其他机构、政府部门、公民社会组织、研究机构以及媒体一起，团结妇女及女童，共同推动男性参与，一起防止与终结性别暴力，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事业在中国的前行。

何安瑞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  
2013年11月25日

# 致 谢

感谢所有的被访者慷慨地与我们分享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就不可能有这份报告，虽然我们必须以匿名的方式将感激埋藏在心底。

虽然在报告封面上只有三位项目助理的名字，但是实际上先后共有八位研究助理参与了这项研究，我们在此对他们的付出表示感谢，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董晓璐、皮兴灿、龚璿、马爽、王舜、崔森，清华大学的王晨阳以及北京同志中心的骆勤。

感谢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中国代表处为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尤其要感谢 Arie Hoekman、Zeljka Mudrovcic 和文华。

感谢预防伙伴、这一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志愿者机构共同展开的针对性别暴力预防的亚太地区联合项目，他们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尤其要感谢 Stephanie Miedema, James Lang 和 Emma Fulu。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帮助我们寻找受访者的朋友和组织，他们是河北省承德县妇联的谢晓琴女士和翟淑萍女士、清河监狱的郑宏宇先生、粉红空间研究中心的何晓培以及张柳、郭婷、马李、姜波和刘东华等。

## 摘要

该质性研究报告《艰难时世：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男性气质和性别暴力》，是“联合国男性与暴力多国研究”的一部分，该项针对男性气质和性别暴力的地区研究项目由“预防伙伴”协调，“预防伙伴”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志愿者机构共同在亚太地区展开针对性别暴力预防的联合项目。该质性研究旨在理解作为个体的男性和女性的生命历史，进而探索他们的生命历史如何塑造了他们现在的性别实践和性别观念，尤其是那些与性别暴力的相关经验、观念和实践。本研究也旨在了解男性和女性生命历程中对暴力的接纳、反思和拒绝，进而梳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霸权与反霸权表达的发展轨迹。

运用生命史访谈的方式，这一研究共访谈了三类人群：

- 十名“性别平等男”，即展现反对霸权男性气质的男性。
- 十名“施虐男性”，即曾对妇女施暴的男性。
- 十名“受虐妇女”，即曾遭遇过性别暴力的女性。

本研究共收集了 30 份生命故事，且大部分被访者都接受了两次访谈。所有访谈录音都被转录成文字，并由项目组成员共同编码，进而确保编码的信度与效度。

本报告一共有五章研究发现章节，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逐步展现被访者的生命叙事：童年、学校、工作、亲密关系和社区，以便把握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性别建构以及性别暴力体验的生命发展历程。研究发现的每一章开头都会展示三个来自不同群体受访者的简要故事，随后是对三组人群的详细分析和异同比较。本报告最后一章为项目实施、政策发展和后续研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童年：**在受访者的童年家庭生活中，父权制的权力划分相当明显，具体就表现为男性和男孩在家庭中比女性和女孩享有更大的权力。男女受访者都表示，父母对于男孩的偏爱常见现象。这也不能只简单将其定义为男孩偏好，而且有时候（按照施虐男性的说法）更聚焦于对于男孩的期望和回报。相反，女孩常承担更繁重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弟妹，一些女孩因此失去上学和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这在较年长的女性受访者中更为普遍。三个群体都有幼年目睹父母家庭暴力的经历。值得注意的是，“施虐男性”更倾向于把暴力合理化，将其解释为儿童教养。

**学校：**三个群体关于学校经验的生命历史的讲述大不相同。“性别平等男”倾向于对学校生活有着更多积极的记忆，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父母、祖父母和老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在这一情境下，这一群体普遍在学校表现较好，受教育程度很高。很多“性别平等男”提到各

种各样的校园活动帮助他们培养起较高的性别意识，这帮助我们理解教育程度与性别平等意识之间的关联。大多数“施虐男性”教育水平偏低，他们倾向于将学校经历与打架斗殴和校园欺凌相联系。当然，也不尽如此，三个“施虐男”在校成绩优秀，有一位还获取博士学位。男性群体经历的异同显现了，教育和学校经历是社会化的重要空间，虽然它不是决定男性走向平等或暴力之路的唯一因素。女性受访者中，年轻妇女受教育机会高于年长妇女，彰显了中国女性教育的代际差异。几乎一半的女性受访者报告她们在学校曾经经历过校园欺凌或性骚扰，虽然从肢体暴力这个角度而言不如男孩遭遇的严重。三个受访组都经历过师生矛盾和来自老师的体罚。“施虐男性”往往选择“辍学”或“考试不及格”的方式来应对这一挑战，而“性别平等男”和女性受访者则相对更有能力克服困难从而继续完成学业。

**工作：**三个群体如何讨论工作和建构工作的意义大不相同。“性别平等男”更多地谈到他们在工作中的激情、动力、奉献精神和满足感，虽然他们也谈及相对收入较低不符合目前将经济成功视为男性气质的重要标准。施暴男倾向于把工作看成维持生存的手段，也是维持他们所乐于的生活方式（例如赌博、酗酒和找小姐）的一种手段。他们在工作中有更多的冲突和挫败感，且这种张力常常会影响他们的婚姻关系。女性受访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承担着“双重负担”：一方面通过参与工作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努力维持贤妻良母的风范。同时，许多女性受访者表示，工作上的成就有助于她们离开暴力的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与暴力：**关于受访者如何看待和应对暴力、暴力与性别规范之间的关系，都揭示了多种形式暴力存在的广泛性——这一研究也发现暴力存在的广泛性，从低级的口头辱骂到极其严重的心理与生理暴力以及性暴力。即便在“性别平等男”的群体。然而，两个男性群体对暴力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性别平等男”倾向于内部暴力也偶有发生。拒绝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对伴侣使用暴力。在那些情境下，暴力被视为不幸的、意外的、最后的出路。这表明父权制价值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潜意识中）影响着“性别平等男”的行为。“施虐男性”更倾向于将暴力视为亲密关系中的正常现象，他们的暴力行为常常与酗酒、赌博等行为引发的伴侣间不满和争端相关。他们也倾向于否认并合理化自己的暴力行为，例如将其归因为他人挑衅或他们自己有情可原的脾气。施虐男性和受虐妇女对于性暴力叙述的差异非常显著，妇女们有着详尽的描述，但男性倾向于只字不提。

**性别规范和应对暴力的社区话语：**总体而言，大多数受访者赞同性别平等的原则以及中国需要实现男女之间平等权利，尽管相对而言，“施虐者”较少谈及这些观点。然而，他们的实践因为对暴力的接受度和使用而各不相同。两个男性群体对于理想男性和理想亲密关系的描述非常相似，然而“施虐男性”更倾向于运用性别规范来强化性别不平等。女性被访者倾向于将传统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视为理想，强调女性作为贤妻良母，男性顶天立地养

家糊口。一些女性被访者对于男性的暴力行为呈现出矛盾复杂的态度，一方面认为针对妇女的暴力是犯罪，另一方面又认为暴力有时是必须的甚至“有些妇女欠揍”。城乡差异在受访者家庭暴力的故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他们对于暴力的看法以及社区如何应对暴力。大多数受访者强调性别暴力预防和干预需要社区、相关组织机构的支持以及多部门之间的合作。

# 第一章：研究概况

## 1.1 背景

《艰难时世：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男性气质和性别暴力》，是“联合国男性与暴力多国研究”的一部分，该项研究由“预防伙伴”协调，“预防伙伴”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志愿者机构共同在亚太地区展开的针对性别暴力预防的联合项目。联合国男性与暴力多国研究包括三个部分：定量的家庭入户调查、政策分析和质性研究。这一报告阐述了质性研究生活史访谈的发现，补充了前期定量研究在中国城乡调研的发现（王向贤，方刚，& 李洪涛，2013）。该质性研究旨在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和解读与性别暴力相关的社会结构、规范、价值观和行为，以及对于暴力的预防。它将和其他两部分研究数据一起构成基于事实的，能够帮助中国消灭性别暴力的可行性计划。联合国人口基金和预防伙伴为该项目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

## 1.2 概念框架

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文中简称性别暴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包涵了极为广泛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最近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ECOSOC，2006）把性别暴力定义如下：

“性别暴力是指任何基于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而实施的违背个人意志的伤害性行为。暴力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性暴力。妇女和女童构成了受害者中的多数，男性和男童同样也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暴力的影响既有身体上的，也有心理上的，且对于受害者及其所处社区有着长期的有害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性别暴力覆盖了多种行为方式，是在特定社会的性别规范中，个体与社会团体之间系统性、普遍性的权力不平等的运作结果（O'Toole, Schiffman et al. 2007）。通常，男性对于女性和儿童施暴，但也要考虑到针对男性、

性倾向不同者和跨性别者的暴力。暴力的形式十分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暴力、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性暴力、强奸、儿童性侵犯、恐同犯罪、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中的性骚扰以及贩卖妇女。此外，除了身体暴力外，口头辱骂、心理暴力、性暴力以及性别歧视也应被考虑在内。

在中国，对性别暴力的研究已经有接近 30 年的历史，大部分研究可以被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对于暴力发生率和风险因素的问卷调查；第二，就如何开展对受虐妇女的保护进行法律探讨，并期望推进反家庭暴力专门法的建立；第三，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为什么妇女遭遇虐待却仍然停留在暴力关系中；第四，探讨如何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来预防和干预性别暴力。

然而，目前缺乏从男性气质的视角对于性别暴力开展质性研究。在这个存在着多元男性气质的社会中，该研究试图探索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下，为什么一些男性不断再生产霸权男性气质，而另一些男性则培育出“友爱的、合作的、分享的和责任”的男性气质。

## 1.3 男性气质

虽然性别暴力包括了多种行为，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最为常见的形式是男性作为施虐者，而女性作为受害者（O'Toole, Schiffman et al. 2007）。因此，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权主义兴起的时候，男性气质开始成为社会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大量的研究动摇了性别关系先天注定的观念以及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本质化的看法（Oakley 1974, Rubin 1975, Connell 1987）。在这一意义上，男性气质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

我们社会所界定为男性气质的那些行为举止可以在个体生活中被发现，但它们的存在超越了个体。男性气质是在文化中被集体界定的，并在社会制度下存在。（Connell 2000:11）



Connell (1995/2005) 认为, 社会拥有多种男性气质, 它们被文化差异所塑造, 也受到种族、阶级、性别和其他制度安排的交叉影响。Connell (1998, 2000, 2005) 认为, 在任何一个社会或在国际层面上, 都存在着多元的等级架构的男性气质。因此, 她引入了霸权男性气质这一概念作为分析男性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工具。她认为: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 某种特定的男性气质都会超越于其他男性气质之上。霸权男性气质因此可以被界定为对于父权制合法性问题在当前普遍接受的回答, 它确保 (或者被认为能够确保) 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Connell 1995/2005: 77)

虽然霸权男性气质的特征在各地各有不同, 但在多数情况下, 被认为与侵略性、力量、自信和 control 自我和他人的能力相关联 (Mirandé 1997; Louie and Low 2003)。同时, 这些特质常被公共媒体和性别刻板印象塑造成“男性气概”, 因而压制了男性日常生活体验和实践中的其它可能性 (Gutmann, 1996)。因此, 对于男性气质和性别暴力研究必须深入分析占有主导性的男性公众形象和男性日常生活和信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 1.4 生态学框架

本研究基于生态学模型的理论框架 (Heise 2011), 此框架被广泛用于从不同层面评估与暴力<sup>1</sup>发生有关的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 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虽然这些因素通常由定量的调查研究来确定, 但质性研究能够更深入地探究导致男性成长为“性别平等男”和“施暴男”的生命轨迹, 并且有助于揭示与男性暴力行为相关的因素是如何影响男性的生活并被个体所实践的。

## 1.5 中国性别暴力

研究指出, 性别暴力在当代中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Tang et al. 2002, Xu et al. 2001, Xu et al. 2005)。同时, 这些研究存在着局限性并将暴力聚焦为在家庭内部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 (Chan 2009: 79)。尽管存在局限性,

但这些研究依然对于男性气质与性别暴力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最近, 作为联合国“男性与暴力”多国研究的一部分, 王向贤等 (2013) 开展定量研究, 1103 名女性和 1017 名男性 (年龄在 18—49 岁) 接受并完成了问卷调查。在曾有过伴侣关系的女性受访者中, 39% 称遭受过肢体暴力或性暴力。男性上报的比例更高, 52% 的受访男性称自己曾经对伴侣实施过肢体暴力。不同类型的亲密伴侣暴力常常相互交叠, 其中 27% 的男性既对伴侣施加过肢体暴力, 也实施过性暴力。根据 1999—2000 年中国健康与家庭生活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 Parish et al. (2004) 发现, 34% 的 20—64 岁女性和 18% 的 20—64 岁男性有过在亲密关系中挨打的经历。

这些研究数据表明, 性别暴力在中国仍是一个普遍和严重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提供了几种解释中国家庭暴力的不同诱因, 发现与父权制霸权男性气质相关的性别规范是问题存在的根本 (Chan et al. 2009, Tang et al. 2002, Xu et al. 2001)。很多学者把中国家庭社会中强调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的组织形式作为一个关键议题被引用 (Xu, Campbell et al. 2001; Tang, Wong et al. 2002; Tang, Cheung et al. 2002; Zhao 2003; Xu, Zhu et al. 2005; Chan 2009)。根据在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开展的焦点小组, Tang, Wong and Cheung (2002: 993) 认为中国社会中特定的文化传统把针对妇女的暴力合法化。他们认为, “中国人倾向于采用受害者共同承担责任的解释, 责怪女性挑衅造成了男性的暴力” (Tang, Wong et al. 2002: 992)。在这些主导性的文化叙事中, 男性被认为是不能控制暴力冲动的主体, 女性的抱怨、不服从行为甚至太过漂亮都是激发男性暴力的借口。然而, Tang 及其同事 (2002) 也指出, 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文化观念是有可能改变的。他们特别指出代际变迁和教育都在挑战将针对妇女的暴力合法化的迷思。在焦点小组讨论中, 他们发现, 年轻的、教育程度更高的受访者相对于年长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参与者而言, 更容易挑战这些传统迷思。

<sup>1</sup> 对在基于性别的暴力中和男性施暴者相关的风险与预防因素分析, 参见联合国对于男性与暴力多国研究中的中国部分定量报告, 名为《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 初步发现》(Wang, Fang and Li, 2013)。



## 1.6 历史与社会情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社会制度、身份制度以及社会关系的重大转变（Kleinman et al. 2011, Liu 2002）。这些转变对当代中国性别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Harriet Evans（1997；2008）在讨论妇女社会角色的转变时指出，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既增加了女性受到性剥削的可能性，同时也空前增加了年轻女性在情感和性方面自我表达的途径。然而，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父权制观念仍然是性别不平等的障碍，仍然为合理化针对妇女的暴力提供借口和挡箭牌。

中国目前还缺乏对于男性气质的系统学术研究。到目前为止，Kam Louie 的研究（e.g. Louie 2002）最具影响力。特别是他对于“文”（界定为文化素养）和“武”（理解为尚武的勇猛）二元性的讨论受到广泛关注。Louie 指出特定的文化形象，例如好汉、才子、君子，这些对于好男人的理想观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这些理想男性形象有着明确规定的文化规范，不包容暴力和虐待行为。例如，Louie（2002：44f.）解释道，作为男性气质理想代表的“君子”，被塑造为文化修养和高尚风度的平衡，并且能够理解道德的重要性。同样，被定义为“武”的理想形象不包容过度的暴力表达，因为他们必须遵守荣誉和自制的道德准则。在这一意义上，限制和拒绝暴力的传统文化和性别暴力频发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某种显著的张力。

Louie（2002）指出，文武二元性并不能完全解释当代中国都市消费主义的男性气质形式。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和利润的强调，理想的男性气质更多地聚焦在经济实力上。因此，关于男性气质的文化理念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变，父权制男尊女卑传统规范可能在逐渐弱化，而多元男性气质则正在崛起。

## 1.7 立法与女性参与

自 1995 年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以来，中国出现了众多的非政府组织，比如中国反家庭暴力网络 / 帆蓓、红枫妇女热线等，致力于提升公众对于家庭暴力的意识，将家庭暴力作为

重要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倡导出台反家庭暴力专门法（Tang, Wong et al. 2002; Tang, Cheung et al. 2002; Milwertz 2003; Xu, Campbell et al. 2001; Zhao 2003）。

吕频等（2011）指出，将家庭暴力视为犯罪代表着解决性别暴力的重要一步。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文出现在不同法律之中，然而一个统一的反家暴法至今尚未通过。更严重的是，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警察、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实体的相关法律责任。

总体而言，在中国社会中既存在着巨大的性别鸿沟，同时也在逐渐趋向平等。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2011》为各国的性别平等所取得的成就排名，评分标准包括女性在经济、教育、卫生和政治方面的赋权。在 135 个国家中，中国位居 61 位，妇女的健康、经济和政治参与远远落后于排名靠前国家（Hausman, Tyson et al. 2011：18）。然而，这份报告在母亲和父亲权力的平等性、继承权、女性获得贷款、土地所有权以及其它财产权上给了中国最高的分数。尽管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意味着中国女性已经通过立法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权利和一定形式的赋权和平等。

## 1.8 研究目标

该质性研究旨在深入了解作为个体的男性和女性的生命历史，进而探索他们的生命历史如何塑造了他们现在的性别实践以及他们的性别暴力的相关经验（作为受害者或者是施暴者）。这个研究也旨在了解贯穿男性生命历程中的男性气质（反）霸权实践的表达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将对比两组男性的生活和实践：一组是那些挑战传统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男性（命名为“性别平等男”）；另一组是那些对女性使用暴力的男性（命名为“施虐男性”）。为研究建立在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之上：

- 对比两组男性，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历程和影响？这告诉了我们应如何促进男性变得更加性别平等和反对暴力？男性和女性是如何接纳或抵抗现有

的性别霸权以追求性别平等？

- 对于“性别平等男”：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有什么特定的过程和影响使得他们开始采用更加追求性别平等的行为呢？在这些男性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所从事的“非传统”的工作与性别平等的实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 对于“施虐男性”：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有什么特定的过程和影响塑造了他们的暴力行为？他们何时、为什么、怎样对自己的伴侣使用暴力？有什么后果？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 对于“受虐妇女”：她的生命历程如何和性别暴力的经验相关联的？这些经验是如何与她们的性别建构和性别实践相关联？

## 第二章：研究方法

### 2.1 生活史访谈

联合国针对男性和暴力开展的多国质性研究，主要采用生活史访谈法来探索男性和女性关于性别规范、性别暴力的生活经历和生命轨迹。该研究延用了此方法，运用生命史访谈，了解中国男性和女性生命历程中的“男性气质和性别暴力”。Paul Atkinson 这样定义生活史：

生活史就是一个人选择倾诉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应尽可能保证完整并且真实。它是倾诉者可以回溯的生活经历，及其对这些经历的理解和认识。生活史访谈通常是在他人引导下完成的。（Atkinson 1998：8）

生活史是一份详实的“人类资料”，它将洞察力运用于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经历，并贯穿于生命历程中的个人行为（Connell 1995/2005）。生活史能够对人生轨迹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纵向分析（Bertaux 1981；Roberts 2002）。生活史提供了丰富、详细的探索途径，聚焦于阶级、种族、社会性别、性、代际差异等各种因素的交叉与互动，塑造并推进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轨迹。

### 2.2 抽样

我们的研究团队包括四名教授和八名研究助理。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受访者，包括熟人网络、电子布告栏、非政府组织、妇联、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居委会、派出所、监狱等。基于预防伙伴开发的生活史访谈提纲，我们结合本国实际，开发了一套本土化的生活史访谈指南。改良的中国版访谈提纲包含如下内容：童年、学校、工作、亲密关系、婚姻、暴力、性别观念和性别实践等。

该研究涉及三个群体，每个群体为十人：第一个群体是“性别平等”男性，他们展现出反对男性气质霸权的行为；第二个群体是“施虐男性”，他们曾经针对妇女使用暴力；第三个群体是受虐

妇女，她们可能经历过不同类型的暴力。运用目的性抽样方法，我们在选取研究对象时会考虑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包括城乡、教育、年龄、工作），暴力的类型（身体、性、心理；长期和短期），以及个案是否涉及法律程序。“性别平等男”在本研究中包括两类：一些是从事推进性别平等工作的男性（付费工作或者是志愿行为），另一些是参与传统认为女性更多从事的工作，例如护士、社工、幼儿园老师等。后两组中的男性和女性均经历了不同类型的性别暴力，包括身体、性、言语、心理暴力。

### 2.3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工作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期间完成。我们共访谈了13名“性别平等男”，11名“施虐男性”，以及16名“受虐妇女”。大多数访谈是在教授督导下，由研究助理完成。访谈地点主要位于北京地区，也有四分之一的访谈在江苏、河北和江西省完成。虽然多数被访者接受访谈期间居住在北京，但是他们的原籍涵盖了北京及其他8个省份。

除少数访谈受限于时间和难度只进行了一轮外，多数访谈均分为两轮进行。第一次访谈内容主要关于被访者的童年、学校和工作经历，第二次访谈主要聚焦于被访者的亲密关系、婚姻家庭以及性别暴力的相关经历。在“一次性”访谈的案例中，访谈者将两次访谈内容进行了整合。基于对研究目的、被访者个体特征以及访谈质量的综合考虑，我们最终从每组中各挑选了10个案例进行资料分析和报告写作。

### 2.4 伦理和安全

预防伙伴作为技术顾问合作为这国际比较研究开发研究伦理和安全指南，本研究即在这一指

<sup>2</sup> 更多关于伦理和安全的内容，请访问：<http://www.partners4prevention.org/about-prevention/research/men-and-violence-study>.

南下开展并改编以适应国内情况<sup>2</sup>。首先，我们将本研究基本信息制作成宣传页，发放给被访者和他们所在的社区，其中提供了研究团队的详细联络方式，介绍了研究主题。其次，我们向所有被访者发放了信息表，列举出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机构和组织。最后，我们收集了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书，确认其参与本研究的意愿。我们向被访者提供了尽可能详实的信息，包括研究性质和参与意义，并明确指出被访者可以在访谈期间自由退出研究。

访谈地点通常选择在研究小组认为安全、隐秘，并且对于被访者而言便利、可行的地点。对于访谈时间和地点，我们将尽最大可能地遵循被访者的意愿。在研究进行的所有阶段中，研究团队致力于保证参与本研究不会对被访者及研究小组成员造成任何伤害。我们遵循“男性访谈男性，女性访谈女性”的基本原则开展访谈，以降低讨论敏感问题所带来的不适。在该报告中，所有被访者的姓名和身份将被匿名化处理，以确保参与本研究不会给其带来任何伤害。

## 2.5 样本特征

十名“性别平等男”全部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年龄介于23-3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7.8岁。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其中有2人获得了博士学位，7人获得了学士学位，1人取得了大专文凭。他们中仅有2人已婚，其他8人均未婚。在工作方面，有2人在非政府组织工作，有3人分别是大学教师、律师和新闻工作者，其他5人从事护士、幼儿园老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

十名施虐男性多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年龄介于27-5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0.7岁。多数人持有农村户口，并且访谈期间主要居住在北京和河北境内。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仅有3人拿到了大专及以上文凭。在访谈期间，他们中有6人已婚，2人离婚，另有2人因谋杀妻子或女朋友入狱服刑。在工作方面，有5人从事体力劳动或经营小买卖，有3人分别从事公务员、研究员和新闻记者的工作。

十名受虐妇女幸存者年龄跨度最大，其中

最年轻者28岁，最年长者达到75岁，平均年龄46.5岁。她们的受教育水平也不尽相同，具体包括：文盲（1人）、小学（2人）、初中（2人）、高中（2人）、大专（1人）、本科（1人）和硕士（1人）。在访谈期间，有5人因家庭暴力已离婚，还有1人正在办理离婚，另外4人尚在婚姻中。在工作方面，1人已退休，2人为家庭主妇，其他分别是企业白领、家政服务者、农民和个体经营者等。

三个群体的年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受虐妇女幸存者分布于各个年龄段，这表明了性别暴力始终存在，深深影响了不同时代的女性。此外，“性别平等男”的年龄小于其他两组，这可能由于我国性别平等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通过性别平等组织和网络寻找到的被访者，呈现年轻化的特征。被访者的户籍来自北京及其他8个省份，这表明了性别暴力在我国城乡社会存在的普遍性和广泛性。

## 2.6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录音被转录成文字材料，在此基础上，我们撰写了每位被访者的访谈总结，包括关键事件时间表、案例简介、访谈发现、访谈感想与思考。整个研究团队反复阅读案例，对转写资料进行编码，我们先分组编码，再一起讨论，运用“持续比较”的方法，反复编码以期实现编码间信度和效度，并从单独的案例分析中探求出主题和模式（Strauss and Corbin 1998；Charmaz 2006）。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被访者对个人成长阶段的叙述，密切关注个体生活史的发展脉络、叙述顺序以及关键转折点。

# 第三章：童年

第三章讨论了被访者在原生家庭的童年经历。通过资料分析，该章讨论的关键主题包括，父母的权力分配与家庭分工、重男轻女观念、体罚和目睹父母间的暴力。

## 案例研究

### 性别平等男

仲泉 1983 年出生在河南农村地区，是家里的长子，博士毕业，目前在一家报社做编辑。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毕业的七年里，仲泉的家庭屡遭变故，父亲做生意失败，母亲重病缠身并长期住院，叔叔遭遇雷电袭击去世，爷爷病故，还有另一位亲戚也去世。家境的败落以及三位亲人的相继去世，使他一度处于极度悲伤绝望之中。然而，父亲坚毅的品格和母亲一心为家人着想的行为让他从绝望中走出来，更加努力学习，学习成绩也逐渐提高。

### 施虐男性

张强 1968 年出生于河南省偏远农村的一个五口之家，目前从事媒体工作，与妻子刚刚离婚。作为家中最大的男孩，他从小被要求听父母的话，行为良好。年少调皮的张强却经常惹恼父母，以至于父母会拿竹竿或者树枝打得他满地打滚。不同于其他挨打的孩子，张强说，自己挨打后从来不跑，但夜里会藏到被窝里哭，他小时候的故事中充满疼痛的记忆。

### 受虐妇女

桂华 1952 年生于河北农村，有 6 个兄弟和 1 个妹妹。她的父亲是专制强权的大男子主义者，母亲是软弱的传统女性，父亲经常对妻子和儿女施暴。桂华不仅目睹父亲和爷爷对母亲施暴，自己也遭受了多次暴力，曾经为免受父亲暴力跪地求饶。桂华很小就扮演了照顾者角色，从记事就照顾弟弟妹妹、劈柴、做饭、做鞋，并从事其他家务劳动。

\*\*\*

这三个案例表明，童年时期遭遇苦难和虐待可能会长期影响个体成年的发展。然而，早期受暴经历的影响是多样的，在有些案例中，受害者很有抗逆力并在成年后摆脱暴力的影响，然而，另一些人可能陷入了暴力的恶性循环，成年后变成了施暴者。因此，这一章要探索什么经历能够促使人们接受反霸权、反暴力的性别观念？同时也需要去探索什么促使男性走上了施暴之路？



### 3.1 性别平等男

“性别平等男”大体出生于和睦的家庭，尽管也有少数目睹了父母之间的暴力。所有的“性别平等男”都谈到了体罚，有一些还谈到了家庭中的重男轻女现象的存在。

#### 3.1.1 有新特点的传统家庭

七个“性别平等男”在核心家庭长大，其他三个在扩展家庭长大。“性别平等男”的原生家庭存在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例如，张浩从小与祖父母住在一起，因为他的父母更喜欢独立的夫妻生活而不喜欢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还有朱宇的家庭，父亲在家，而母亲则外出工作养家。这些与众不同的家庭特征可能有助于他们对性别角色、性别分工和性别平等的理解，因为他们对家庭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家庭内部的权力与分工也有不同的感受。

七个家庭符合“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然而，有些父亲虽然外出挣钱养家，但在家也与母亲一起分担家务。曹宏告诉我们：

在我家，父亲主要做饭，母亲负责洗衣服。有时候，像蒸包子、蒸饺子、烙饼这些事是我妈来做；有时候，碰到大件了，就是像床单、被罩这样的，有时候我爸就会帮助一块洗。（曹宏）

其他三个家庭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母亲更强势并成为家庭的主要供养者。朱宇的母亲一直都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然而父亲却是一个失败的商人，一直呆在家里：

我妈会用很多攻击性语言，直接攻击到我说你以后千万不要长成（你爸）这样的男人。——他（父亲）好像承担了传统角色中女生的角色，就是做饭、洗衣服这样的家务活，基本上是他来干，所以实际上我小时候跟我爸亲，因为我妈出去工作。——我经历过一段很恨我爸的时段，因为我觉得是我爸没有担负起所谓男性的角色。（朱宇）

在该案例中，传统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的逆转增加了父母之间的张力，也增加了父子之间的张力。这说明了，朱宇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什么是理想男性和男性气质的概念，而父亲充当了反

面教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传统性别角色对家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母亲内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驳斥丈夫不能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朱宇对父亲的感受，也由亲密变成对间或的怨恨，这对他后来新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平等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3.1.2 原生家庭的家庭暴力

六个“性别平等男”认为，他们出生在和睦的家庭，父母相处融洽的很好。父母有时候也发生一些矛盾，但是他们一般都努力解决这些矛盾。其他四个“性别平等男”说他们的父母经常发生矛盾，甚至达到暴力冲突的程度。社会工作者罗文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我小的时候，他们总是大吵大闹，大多都是因为钱——有时候，爸爸有点暴力倾向的，脾气暴躁，我们都很害怕；还有时候，爸爸不回应，妈妈就会把脾气撒在我和妹妹身上。（罗文）

总体而言，“性别平等男”倾向于将暴力视为错误的和不恰当的行为，对于目睹父母的家庭暴力对自己的影响也有较为具体的反思。有一些人明确表态，他们不愿意自己的亲密关系犯类似的错误。尽管在少数案例中，例如罗文，在他的成年亲密关系中也曾有过动手的行为，但在行为发生之后，他非常后悔且有较为深刻的反思。

#### 3.1.3 重男轻女和体罚

一些“性别平等男”清晰意识到重男轻女观念存在于自己的原生家庭。例如仲泉说：

我爷爷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孙子，所以我小时候得到家里人的很多关注。因此，我妈在生二胎方面的压力不是很大。（仲泉）

尽管仲泉的妹妹比他小六岁，他仍然觉得家庭更重视他，甚至包括他母亲。仲泉试图解释母亲这样做的原因：

我妈可能觉得，以后妹妹是要嫁人的人了，我才是能给家里带来荣誉的。（仲泉）

重男轻女这一思想看来影响了很多受访者的

童年生活，然而童年的体罚经验对他们的个人成长也很重要。十个受访者在童年里都曾经历一些体罚，有三个人遭受过严重体罚。例如魏明就讲述了父亲通过打他来纠正他不良行为的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奶奶过生日，我姑姑、姑父他们都来了，可能就是比较任性吧，就顶撞了我姑姑——我姑打了我一顿，我特委屈，我去找我爸，没想到我爸又打了我一顿。（魏明）

魏明认为，他之所以遭受到来自他姑妈和父亲体罚是因为他的行为违背了尊敬长辈的中国文化，因为小孩顶撞长辈是不允许的行为。总体而言，很多受访者弱化他们的体罚经验，倾向于用儿童养育和惩罚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经历。但是也有很多受访者明确表示不应该体罚孩子，体罚就是一种儿童虐待，并表明他们希望用更加宽松和民主的方式去养育他们自己的孩子。

## 3.2 施虐男性

“施虐男性”的原生家庭多为男强女弱的家庭，一旦男性权威遭到挑战，暴力常常是随之而来的后果。童年遭遇虐待和目睹父母的暴力在这一组非常常见。此外，他们常认为重男轻女还广泛存在，他们也能说出父母偏爱儿子的一些行为和表现，但又不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 3.2.1 “男主外，女主内”

六名受访者解释，在他们家庭中，父亲在外养家糊口，而母亲照顾家庭，父亲是家庭决策者。这一状况符合儒家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正如受访者刘淇所说：“男主外，女主内。”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性别分工，张强回忆说，“父母常常争吵，就是因为我爸懒不爱干活。”由于母亲承担照顾孩子的传统角色，很多受访者表示在童年和后来都与母亲更加亲近，而与父亲不够亲近。陈白把父亲描述为一个勤恳的共产党干部，只知道为国家工作，不知道顾家庭

小的时候跟母亲亲近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小的时候经常跟母亲在一起，我父亲不在外面工作嘛。他回去大概也就是半月、二十天，尽管都在我们老家的那个县了。所以说小时候家里任何事情都是我母亲操心，我父亲就挣了工资给个钱。（陈白）

在这个群体中缺乏父子之间的交流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 3.2.2 “家庭暴力没什么大不了”

在这组受访者中，男性童年目睹父母暴力经历与他们成年后对妻子和孩子的暴力之间的联系十分显著。10名受访者中，五人在童年时目睹过父母争吵甚至打架。他们称父亲和母亲都可能是家庭暴力的实施者。高飞说，“我爸那人脾气不行，喝点酒就闹事，总跟我妈打架，谁也弄不了。”有时候，他们站在施暴父亲的一面，责怪母亲挑起矛盾，如陈白说“我妈遇到事心里面老想，再一个就是爱唠叨。”

很多受访者相信父母那一辈人并不认为家庭暴力是严重的问题，也不会因此离婚。例如，杨子引用一个中国俗语并解释道，

床头吵架床尾和——几千年的风俗，离婚是很少见的，打打闹闹也是一辈子的事，也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就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也不会去影响到什么，感情破裂或什么这样，不像现在想的那么复杂。（杨子）

杨子的解释说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理解还非常有限：个体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生活经历、不能面对暴力行为，甚至使用俗语来合理化暴力。直到最近，家庭暴力才成为一个公共话题。

### 3.2.3 “棍棒出孝子，不打不成才”

与“性别平等男”相比，这组受访者不认为重男轻女对他们生活有重要的影响。他们也承认确实有时候男孩被特别“宠爱”，重男轻女似乎确实存在，但他们没认为这有多么不平等、不公平或者不寻常。所有十位施暴男都出生于核心家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七人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另外三人则是长子。最年幼的孩子相比哥哥和姐姐们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溺爱。例如孙明说，“小时候几乎没怎么干过活吧，因为我母亲最疼我吧，我大哥也是最照顾我。”作为长子的三位受访者常常承担起额外的家庭责任，包括照顾弟弟妹妹。王喜告诉我们：

我刚上班,挣的几个钱都拿给弟弟妹妹读书。  
那时候他们读小学。(王喜)

他们记不清生活中是否遇到过性别歧视的事件,他们只是很简单地沿用官方话语,“(男女)都一样,不会分什么男的女的,都是平等的”(王喜)。少数受访者承认,农村地区有重男轻女的现象,但他们又同时强调自己家里没有这种性别不平等。

然而,与“性别平等男”相似的是,他们认为,童年遭遇的体罚和暴力很普遍。父母惩罚孩子的方式不太一样,正如陈白所说:

挨揍的不多,但是挨训的时候多。我爸很少揍,我爸的教育方式挺好。我母亲有时候爱吵架,有时候打你一下什么的,不过那都很轻的。(陈白)

王虎谈到他那十分暴虐的父亲,自己需要听话、顺从、讨好父亲以避免挨打:

我的父亲脾气不好。我不敢和他说话,特别是当他喝醉的时候。他经常酒后打我们。开始我尝试逃跑,结果发现,如果他找不到我会更加生气。后来我的办法就是呆在他身边,准备一杯水,奉承他并让他高兴起来。(王虎)

受访者在当时可能会感到一定的委屈,然而成年后,他们大多把父母的暴力理解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回顾童年被打的经历,张强甚至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我觉得小时候父母这种苛刻的教育,甚至残酷的启发方式,让我们从小就知道,要学习、要奋斗、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很穷,而这就化为一种动力。(张强)

### 3.3 受虐妇女

与男性受访者一样,女性群体生活在结构不同的家庭。有一人成长在单亲家庭中,三人在核心家庭中成长,另外6人居住在拓展家庭。在城乡方面,有七人的原生家庭位于农村地区,三人的原生家庭在城市地区。有两人是独生女,然而大多受访者有兄弟姐妹,最多的有七个兄弟姐妹。女性被访者也目睹了大量的父母间的暴力,包括言语暴力、心理暴力和肢体暴力等。女性受访者认为,造成暴力的原因包括父亲外遇、家庭贫困、酗酒及其他恶习、家务争执等。

#### 3.3.1 原生家庭特征

在家庭关系方面,有三人认为,她们的父母关系平等和谐。有一人认为,她的家庭是由反传统的“强势母亲”和“弱势父亲”构成,另外六个家庭均为男性强权的父权制家庭,父亲享有比母亲更大的权力,具体表现为父亲专制、暴力,母亲温柔、顺从。

父母社会支持网络的变化会影响家庭动力,也会影响父亲的施暴行为。例如,英子15岁时举家搬迁至河北老家,因母亲的娘家在当地,舅舅常出面干预父亲施暴,自此父亲减少暴力。家庭财政权由母亲掌管之后,父亲逐渐开始听从母亲的安排。

#### 3.3.2 女孩的不公平待遇

女性被访者指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为了传宗接代,导致重男轻女思想极为严重,这与“性别平等男”的表述呈现一致性。香儿发现家庭资源更多向男孩倾斜。不仅如此,受限于父权制和家庭利益的影响,女孩的婚姻自由有时也会被剥夺:

我父亲为了传宗接代,宁愿牺牲女儿的婚姻,不顾及闺女经受多大的牺牲和付出。为了给我哥哥娶个媳妇,我父亲就强迫我姐姐嫁人,换了些彩礼。(秀丽)

多数被访者在童年从事家务劳动,尤其是作为长女的女孩,不得不在童年承担大量家务劳动,甚至在母亲角色缺失的家庭中,还承担了“母亲”角色。英子记得她的母亲就过着非常忙碌的生活,既要上地干活,又要忙活家务:

她得天天上地干活,回来还得给我们做衣裳、做饭,我有3个兄弟姐妹,最小的弟弟老是生病,她还要照顾我们,一点也没闲空。(英子)

与忙碌的母亲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亲们却很少做家务,秀丽说道:

我爹爹绝对不刷碗,不洗衣服,很少下厨,他老觉得这应该是女人干的活,我爹爹虽然有文化,但还是大男子主义。(秀丽)

许多女性被访者的童年生活极其艰苦,不仅



要努力做家务还要去照顾家庭。如作为长女的桂华，因母亲上地干活，她从记事就在家照顾弟弟。受多种原因影响，多数女孩遭遇来自家庭的不公平对待。如上文所述，桂华受父亲阻挠，失去了上学的机会。金星认为她的姐姐和弟弟都比自己受宠，就因为自己是“夹心饼干”女孩。英子也提到，农村家庭往往以传统性别观念教育子女，认为女孩不是“睁眼瞎”就行，然而更强调女孩要学会干活。然而，在城市家庭中，特别是“现代”独生子女家庭，往往突破传统观念束缚，不完全以传统性别角色规范女孩，并且教养方式比较开放。如墨墨成长于一个北方城市，父母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氛围民主平等。她的学业生涯非常成功，最终取得硕士学位。

### 3.3.3 童年所经历的暴力

父权制主导的家庭中，父亲普遍对子女施暴。子女受限于自身能力，通常无力反抗，或者受孝道观念约束，被迫在恐惧、软弱中忍受暴力。据英子讲述，“父亲脾气暴躁，我经常挨打。用什么样的办法都不能讨好他，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无功，最终只有一顿胖揍。”有些家庭中，母亲为了保护孩子，也会遭遇父亲施暴。桂华说：

我父亲挺暴力一个人，从打我记事反正啥事都得他说了算……他要是有啥不对，别人不敢跟他说……我母亲太老实了，我父亲说啥是啥，她也不敢吵架。（桂华）

访谈资料显示，部分遭遇父亲施暴的母亲，可能转而扮演了施暴者的角色，例如，香儿的母亲经常一生气就打她，有时冲撞家长的行为也会招致暴力。

## 3.4 讨论

我们发现三个群体表现出一些共性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原生家庭普遍呈现为父权制特征。很多家庭中的夫妻权力极端不平衡，男性施暴者的家庭表现尤为明显。即使父母均在外工作，父亲仍然当家作主，照料家庭的工作依然由母亲承担。然而，在“性别平等男”和年轻的城市女性家庭中，则出现了替代性的家庭模式，呈现了非父权制角色示范和家庭安排。

被访者早期家庭生活经历与其在后来生活中处理性别权力关系的方式密切相关。尤为显著的是，在亲密关系中倡导性别平等、反对暴力的被访者，普遍成长于性别平等家庭。同样地，在夫妻关系较平等的家庭中成长的女性被访者，在以后的生活中更有可能反抗暴力。

“施虐男性”多数在原生家庭中经历过的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和权力分工。很多被访者的原生家庭呈现父权制模式，突出表现为父母对男孩的偏爱和优待。长子通常被委以家庭重任，而幼子则可以摆脱家务，无忧无虑的度过童年。这样的经历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被访者后来对性别关系的理解和认识。此外，成年生活中遭遇严重暴力的女性被访者，其在儿时往往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及照顾弟妹的义务，甚至被剥夺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反过来，这严重制约了她们参与有偿社会工作和融入公共生活的能力，进而在面对来自亲密伴侣的暴力时更有脆弱性。

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曾遭遇父母体罚，多数人会目睹过父母间发生的严重家庭暴力。有一些被访者有能力介入父母间的争吵，而一些被访者则面临父亲频繁且残酷的暴力，却无力应对，只能默默忍受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试图逃跑来摆脱暴力。他们对家庭暴力的诠释可能会影响未来处理家庭矛盾的策略选择。“性别平等男”强调家庭暴力是不合法的，声称绝不“重蹈覆辙”。“施虐男性”倾向于正常化暴力。“受虐女性”则更多地强调她们所经历的恐惧、无助、和情感疏离。

## 第四章：学校

第四章将重点探讨被访者早期的学校经历。在非常重视学业成绩的中国，对学业成就的探讨是至关重要的（Chao, et al. 1996; Taylor et al. 1995; Seginer 1983），它将长期影响个人发展机会、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Duncan and Hodge 1963; Meara et al. 2008; Mirowsky and Ross 2003）。在这一章，我们深入剖析被访者的就学经历、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以及学校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对于性别和暴力的看法。

### 案例研究

#### 性别平等男

蒋航的爸爸和妈妈在孩子教育上持不同的观点。妈妈因为文革而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所以她希望儿子尽可能获得高等学历。与之相反，爸爸则认为上学的事情不能勉强，由孩子的天性决定。蒋航认为自己在艺术方面有天分，高中时，他没有和父母商量，自己选择了文科。他大学选择了学前教育专业，这是一个女生为主的专业。他的大多数男同学都转到其他专业，但他坚持下来，现在就成了为数不多的幼儿教师之一。

#### 施虐男性

王虎从小调皮，不喜欢学习，经常逃课去外面玩耍。初二时，王虎遇到一位非常负责的老师。她注意到王虎的缺课现象，鼓励他努力学习，对自己负责。此后王虎在学习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成绩也有了进步。初三时，这位老师调走后，来了另一位严厉且暴力的老师。他又开始讨厌上学，成绩直线下降。初中毕业后，王虎便直接参加了工作。

#### 受虐妇女

英子家中有姐姐、弟弟、妹妹，自小照顾弟妹、做饭、做家务，九岁时母亲才允许她上学。从小学到初一，她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并担任班干部，深受老师喜爱，但却遭到女同学嫉妒、欺负，在二三年级时尤为严重。她从不忍受暴力，敢于反抗，甚至还打过对方耳光。父亲得知这些事情从来都是打骂她，母亲也主张“忍着别闹大”。初二时，她担心家里负担重，也担心父母打架，导致经常分心，随之成绩下降，最终选择退学。

\*\*\*

蒋航可以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上学，而王虎和英子的正常学校生活则面临很多阻碍。父母间的冲突往往成为影响英子学习分心、成绩下降的重要因素。王虎和英子都难以与老师或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最终两人都选择了退学。

## 4.1 性别平等男

总体而言，“性别平等男”群体倾向于讲述学校生活的积极经验，尤其在学业成就和师生关系方面。然而，他们也提及了与教师的不良关系以及他们的应对方式。

### 4.1.1 学业良好

在“性别平等男”的早年生活中，学业表现在他们的童年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对校园时光记忆犹新，强调学业良好的重要性。他们大部分在中小学都是“尖子生”，后来也取得了较高的学历。他们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文化修养的价值观，这与 Louie (2002) 关于中国男性气质中对“君子”的描述一脉相承。一位 34 岁的社会工作者张浩告诉我们，他爷爷奶奶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能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好大学。所以学习成绩对他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在考试中得了一次低分，他就会被禁止玩耍、看电视、读漫画书、放学后必须早回家。他必须得努力学习，达到他们的期望，学业良好。

### 4.1.2 复杂的师生关系

总体而言，在“性别平等男”中，学业良好的学生通常与老师的关系良好，其中的一些人把老师列为自己生活中的重要他人。例如，朱宇提到二、三年级的班主任对他有重要的影响。

她很会讲课，也很体贴，照顾所有的学生。如果她注意到你不开心，她就会在私下里找你聊天。她很关注我，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学习成绩进步很快。（朱宇）

一些“性别平等男”组中的受访者也谈到他们与老师的关系不好，因为这些老师常以不同的方式体罚学生。然而总体而言，他们似乎应对较好，依旧保持良好的成绩，似乎不良的师生关系或者体罚没有对他们个人成就产生持久的影响。魏明告诉我们，在农村里，体罚和区别对待是影响师生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对曾对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激发他不公平的情绪、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他的学习成绩等。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上学并获得了护士专科学历。所以说，除了师

生关系外，学业成就也许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支持、个人动力、同伴支持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等。

## 4.2 施虐男性

总体而言，“施虐男性”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系不佳，学校生活对他们而言，既遥远也不深刻。与“性别平等男”群体相比，他们常常倾向于用武力在学校与同辈群体中证明自己的力量和成功，而不是用学业成绩。

### 4.2.1 老师、学生和学业成绩

十名“施虐男性”中只有七人完成了初中教育，另外三人接受了大学教育，其中张强获得了博士学位。与“性别平等男”相比，这七人对于学校生活的描述也明显简略、浮光掠影。学校教育似乎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影响有限，而且总是与大量的冲突和失望的情绪相联。只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陈白、何顺和张强三人表示怀念上学时的勤奋和所取得的荣誉。

我小学、初中、高中，学习都挺好的。而且，在小学一直当过班长、学习委员。（陈白）

张强小时候曾生过一场重病，并来北京住院，这后来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原因在于，这个经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对教育和城市社会流动的认知。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农村男孩，刻苦学习是他出人头地、被人尊重的唯一途径，也成为他努力学习的重要动力：

我在北京治过两年病，也算开了眼界，见了世面，觉得外面的世界真好。然后回去之后，因为身体原因，自己腿不好，应该发奋好好学习，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学习、学习、再学习。（张强）

学业良好的受访者大多与老师的关系良好。例如，何顺说：“像我们这样学习好的，都是批评较少，表扬较多。”然而，其他受访者则很少谈论学校生活。他们认为“自己和老师的关系比较冷漠”，甚至对于学校生活也没有清晰的记忆。在本章开端所叙述的王虎在学校的故事非常生动，他曾与老师建立良好的关系，但因老师变动时间非常短暂。这显示了，老师在受访者的童年与青

少年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好的老师能激励学生进步，而差的师生关系则对学生的各个方面都有负面影响。

### 4.2.2 校园暴力

较“性别平等男”而言，本组受访者的校园暴力经历非常普遍和突出。几位受访者在“校园打架斗殴”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孙明承认：

没事打架什么的，就挺有威望的，别的小孩都听我的。（孙明）

王虎合理化校园暴力，并通过打架来获得别人的尊重，提高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看起来更有“爷们气质”：

当时挺淘的，经常两伙打架，我老是赢，大伙那时候都比较尊重我。（王虎）

一些受访者是打架事件的受害者。如牛军承认：“我因为受高年级同学的欺负才跟同学第一次打架。”一般而言，有很多施暴男性受访者认为，打架斗殴是他们青少年校园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他们将打架的过程描述为加固同学感情的一个过程，这是他们建构霸权男性气质的早期经验，而这一经验又在同辈关系中得以维系。

## 4.3 受虐妇女

十名女性受访者大多在学校表现良好，但是，她们常常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甚至要外出打工赚钱养家。这些额外的负担使得她们无力专注于学业，成为她们辍学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40岁以上的被访女性中相当明显，她们对自己的受教育权利“被剥夺感到不满和无奈”。例如，桂华的父亲观念落后，认为女孩读书没用，因此，她没有上过一天学。然而，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被访者普遍顺利接受了完整的学校教育。蜥蜴和墨墨在该组中最年轻，拥有最高学历，且都来自独生女家庭（Fong 2002; Tsui & Rich 2002）。

### 4.3.1 师生关系和校园暴力

据被访者讲述，她们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往往取决于学习成绩的好坏。例如，香儿、金星和慧

霞均表示，因成绩一般导致她们与老师的关系也一般，其余六人皆因成绩好或听话而“受宠”。被访女性普遍认同，要想真正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好女孩，学业良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女性受访者中，有4人表示经历过校园暴力，或作为施暴者，或作为受害者。香儿提到因她家是村中独户而受到姓氏歧视，被其他小朋友欺负。英子因成绩好而被同学欺负：

二三年级可挨欺负了，我学习好啊，老师就稀罕我呀，他们就嫉妒，嫉妒就骂我，他们围成一圈欺负我。（英子）

然而，与“施虐男性”群体相比，女性被访者经历的校园暴力很少涉及严重的肢体冲突。墨墨说道：“我欺负别的小朋友主要是以阴谋诡计为主，不以暴力为主”。男孩之间多呈现为肢体暴力，而女孩之间呈现为言语暴力或轻微的肢体冲突，这可能与社会建构的性别期待相关，女性应该是和平且无暴力的。暴力有时常常和浪漫关系相关，墨墨讲述了这样一次暴力对抗的经历：

初中时我有个男朋友，隔壁班的女孩也喜欢他，然后她就非常恨我。有一天我们狭路相逢，她骂了我一句，当时我就火了，下课找了几个女同学把她围住教训了一番。（墨墨）

## 4.4 讨论

我们发现，在学业成就及教育在他们人生中发挥的作用等方面，三组被访者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平等男”大多学业良好，且接受了高等教育。“施虐男性”中，只有三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他人受教育程度有限。我们不是暗示暴力只发生在低教育人群，但确实能看到学业成就、个人自信、教育带来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特别在强调学业成就的中国，他们不需要运用暴力来建立自己的权力，展现自己的男性气质。女性被访者的代际差异尤为突出，年长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往往受限于家庭因素，如家庭矛盾、贫困、家务劳动、照顾弟弟妹妹、重男轻女的影响。然而，年轻女性则可以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城市地区的独生女家庭。这表明，良好的受教育背景可能会减少女性遭遇或实施暴力的风险，有利于培



养她们建立平等关系的意识，增强其反抗亲密伴侣暴力的能力。

被访者的入学经历和学业成就，与其后来的社会流动和职业发展息息相关。“性别平等男”的职业成就明显高于“施虐男性”。许多年长被访女性的学业成就也相当有限，而在学校表现优异的高学历年轻女性，则进入了中产阶级的白领生涯。许多“性别平等男”指出，他们通过参加学校活动、参与老师研究项目，或者受学校重要他人的影响，树立了较强的性别平等意识。“性别平等男”的讲述表明了接受高等教育与增强性别平等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学业成就有力地帮助他们树立了大家认可的男性气质，因此他们不太需要使用暴力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由于男性施暴者无法通过学业成就获得社会支持和认可，因此暴力便成为他们展示男性气质的方式，这恰好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更多提到了参与校园暴力的经历。

校园暴力是影响被访者学业成就、人际关系和个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Glew, et al. 2005; Olweus 1997; Smith et al. 1999）。校园暴力对“施虐男性”和年轻“受虐女性”的生命历程影响更加显著。对于“施虐男性”而言，他们在同伴关系中充斥着冲突和沮丧，很难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女性被访者的代际差异格外明显：年长的女性通常经历了相互关爱、和谐的同伴关系，而年轻女性则像男孩一样，目睹甚至经历了校园暴力，虽然暴力的严重程度较低。这些发现突出表明校园暴力可能会给儿童发展带来实质性、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因此制定应对校园暴力的有效策略，并为校园暴力受害儿童提供全面支持是极其必要的。

纵观三组被访者，我们可以发现学业成就与师生关系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在学校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往往与老师关系融洽，倾向于认同老师的付出，并将他们的学业成就与老师的支持相联系。成绩较差的学生不仅与老师的关系不够理想，还侧重报告与老师的关系冷淡以及来自老师的不公正对待和体罚。女性被访者倾向于认为，只有学业优秀才能获得老师的认可。这些不同的解释表明了老师对学业成就的认同如何影响学生性别观念的形成。

三个群体均提到了教师体罚，其中施暴男性受之最甚，甚至成为他对学校生活的最鲜明的记忆。他们通常采取退学或学业失败的方式应对体罚，而“性别平等男”和“受虐妇女”似乎更能克服或忽视暴力经历，延续在学校中的良好表现。这不同的表现与更大的童年成长环境相联系，如果获得有力的家庭支持、较强的个人动机、同伴支持或其他的师生关系都有可能帮助他们战胜来自体罚的特定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早期在学校遭遇学业失败和排斥有可能对个体后来的身份建构以及对自我价值和成功的认识密切相关。对于男孩而言，校园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场所，塑造个体对男性气质或作为男人的主要特质的认知。对于女性受访者而言，她们对于教育的描述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对年老的受访者而言，教育是奢侈的，通常都优待男孩的。对于年轻的受访者而言，教育更类似为一种权利，这些社会变迁带来的对女孩教育的重视无疑对她们后来应对暴力关系的能力有所提升。相应地，鼓励男孩和女孩勤奋学习，减少教师体罚，将能从实质上帮助他们在成年后构建非暴力的人际关系。

## 第五章：工作

第五章探索受访者的工作及在工作场所的经历如何与社会性别、男性气质、权力、代际以及地域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该章分析的核心主题和核心概念包括：工作的付出与成就感；工作作为成功男人的标志以及不能实现这一角色的挑战；妇女面临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

### 案例研究

#### 性别平等男

南龙在大学期间就对性别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一家推动性别平等的机构做了四年志愿者，毕业后就加入了该组织，专门从事青少年性别平等性教育。他强调把社会性别和权利的视角整合到性教育里去，同时引入一些性别暴力和校园暴力的内容。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激情，认为这份工作改变了他对男性气质的理解。虽然一些亲戚并不支持他，但是他的朋友和家人都很支持他。

#### 施虐男性

从师范大学毕业后，何顺被分配到乡中学当老师，后来又升任副校长，事业可谓一帆风顺。2003年，他和妻子同时参加县公务员考试，妻子考上后调入县城升任公务员，而他却遗憾落榜留在乡里。夫妻分居一年后，何顺想办法调入县城未果。更糟糕的是，他从副校长被降职为一名普通教师。他感觉工作不顺心，和领导的关系搞得很僵。在家庭中，何顺感觉也失去了以前的威信和地位，夫妻关系愈发冷淡，双方频繁争吵，甚至上升到肢体冲突，最终他们选择了离婚。

#### 受虐妇女

遵从父亲教导，冬梅选择当一名老师，能力获得学校认可，她说教书的七年最幸福。因丈夫在北京工作，冬梅从外地调入北京工作，因要照顾孩子上学而调到丈夫单位。她的同事间没有人情味，受各种条件限制，直到退休也未涨过工资。工作中，她甘于付出，很能干，同时她还承担了所有家务。丈夫因外遇将她轰出家门后，她参加反家暴妇女支持小组，逐渐参与到受暴妇女援助工作中，从受助者变成了助人者。

\*\*\*

通过三个组的对比，我们发现由性别权力关系建构的工作方式存在显著差异。20多岁的南龙在北京的一家NGO工作，致力于促进两性关系平等的建构。40多岁的何顺在中国的中部地区传统的环境中工作。与妻子相比，他的平凡工作成就使得他们的婚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引发家庭暴力，最终导致离婚。何顺的故事表明在主流社会，妇女获得成就是可能的，但也可能会引发家庭冲突，并颠覆性别分工的文化期待 (Wang and Nehring, in press)。70多岁的冬梅曾经在多变的工作环境中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工人。她的故事反映了在中国变迁时代，传统价值观和性别关系不再固若金汤，妇女面临新的机遇和旧的约束，肩负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李晓江，2010）。

## 5.1 性别平等男

根据目的性抽样，该研究有两类性别平等男：六个人在 NGO 和其他部门工作，倡导性别平等或者为边缘群体提供服务。另外四个人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女性工作的领域工作，如护士、幼儿园教师等。

### 5.1.1 使命、成就感和优势

对于 6 个在 NGO 工作的人来说，日常工作增强了他们的性别平等观念。倡导性别平等和对弱势群体的非歧视是他们的重要使命。例如，南龙有意识地努力把社会性别视角与性教育结合起来，朱宇一直致力于性工作者权益和艾滋病患者保护的领域。张浩是一家 NGO 的主管，致力于艾滋病问题超过十年之久，他实施了一系列帮助艾滋病感染者的项目实践。相应地，他们的工作所代表的尊重人权和性别平等——特别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影响他们的信念和实践，帮助他们建构男性与女性之间非传统的、平等的关系。受访者也知道他们不可能像其他行业的同龄人一样赚很多钱，但他们似乎从社会参与和公共服务的丰富经历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有时候，受访者认为，他们工作是为了提高公共福利这一本质给他们带了声誉、社会地位以及同龄人的尊重。例如，当张浩为艾滋孤儿建立一所学校的时候，他的一些朋友就给学校捐钱和书籍。

我的很多朋友十分支持我，当我组织一项活动时，他们就来捧个场，然后介绍一些朋友给我，有朋友在出版社工作，他会捐他们的书过来，我们可以省一些钱。（张浩）

尽管工作中有许多困难，但是那些在 NGO 工作的人普遍都说自己有很高的工作满足感，他们用“快乐”和“自我实现”等词语来描述他们的工作状况。许多人认为，这一工作满足感给他们带来积极的影响，自我实现、自信以及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蒋雷这样说道，

（工作）让我变得慢慢的越来越开放——之前我就是非常的自我保护的人，不愿意去表达我的任何的思想观点——自己有意愿开放一些，然后慢慢就给我提升一些自信。（蒋雷）

对于那些从事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女性职

业的受访者来说，工作场所不平衡的性别比例有时成为他们得到关注和晋升的优势。这也是他们持续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幼儿园当老师的蒋航说：

现在幼儿园男教师缺失比较多，所以领导现在对我们这些男教师比较重视，女教师超过 100 个，只有 3 个男教师。男教师还是挺有优势的吧。（蒋航）

虽然很难量化工作满意度的程度，在 NGO 从事性别平等倡导的男性视角促进性别平等和消除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是他们的重要使命性；然而，从事传统女性职业的四名男性觉得性别刻板印象还是存在于职业中，他们有时会觉得自己被刻板定型化，对工作也没有那么多的激情。

### 5.1.2 压力、挑战和困难

尽管“性别平等男”的工作给他们带来许多满足感，但是受访者们也提到他们需要应对两个主要的压力和困难。一个是收入相对较低，许多人抱怨他们的工资不足以给他们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们认为自己在工作上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例如，曹宏说：

挣的钱不够我花，生活压力很大。有点不公平的地方就是做项目人拿的工资吧比坐办公室的人要低。（曹宏）

另一个压力来自家人、亲戚和朋友。对于那些在 NGO 工作的受访者来说，他们的家庭、亲戚和朋友有时并不支持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不够好或者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一些受访者也分享了他们在工作上的困惑和挫折，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继续自己选择的道路。南龙说：

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走多远。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工作上做出的努力方向是不是正确的。（南龙）

对于那些从事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女性”职业的受访者而言，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与性别规范和性别刻板印象有关。从事社工的蒋雷曾经就受到一个亲戚的挑战，这位亲戚直接告诉他，“女孩子做这些事情还可以，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你会做这个事情？”作为一名男护士，魏明有时候觉

得自己被瞧不起，不仅是因为他的工作，如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一个男的至少应该在医院当医生”；而且因为性别刻板印象，有时候他被病人排斥因为“他们认为女护士比男护士更加体贴和细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张力似乎并没有演变成与配偶或女朋友之间的冲突。尽管他们可能觉得压抑、受挫或者面临压力，但是这些“性别平等男”一般都会把工作问题和家庭生活分开，尽力维持私人生活中与他人的积极关系。这可能是与他们从工作中的承诺和满足感相关，也与接触了多元的性别规范和性别实践相关。

## 5.2 施虐男性

与“性别平等男”相比，“施虐男性”对自己的工作没有那么认同。对他们而言，工作只是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不是为了追求使命感或自我满足度。他们的工作中充斥着大量的冲突与挫折，由此带来的紧张感常常蔓延到家庭中。

### 5.2.1 暴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陈白、何顺和张强三人，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并且拥有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师范毕业后成为老师，后因对薪水不满而更换工作。另外七人则从事体力活动或自己经营小型生意，包括瓦工、搬运工和矿工等。他们中一些人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有些甚至没有工作意愿。例如，孙明和高飞在高中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所事事。总体而言，“男性施虐者”受访者收入较低，所以他们普遍感觉事业不成功，对自我评价较低：

我现在没有固定的工作，不稳定，老是想干这个，想干那个，哪个也干不成。这点可能妻子不能忍受。（牛军）

对工作的不满意或因为有限的升迁机会，或因为失去现有职位的权力。例如，何顺说：

从副校长降职为普通老师，工作中就有了挫折感。我当副校长的时候，跟校长关系处的也很好，同事关系也都和谐。有时候学校做什么决策，我们一般做参谋，我说的话基本上都被采纳。从一个副校长降到一个老师就有点不适应。（何顺）

工作中的压力和挫折感常常会导致“施虐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力争夺和冲突，因为他们依然坚信自己应该成为养家糊口的男人。

她当时也没工作，都靠我一个人，要养活农村的父母，还有孩子。（张强）

工作上的受挫感和无力感常常会被他们带入家庭生活，有些受访者就会把这些压抑向妻子发泄。

挣钱越来越难了，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有时候似乎我妻子对于我的收入并不满意，她就抱怨，我们常常因为这个争吵，有时候我脾气一上来就打了她两下。（张强）

他们倾向于对职场的女性持有负面的态度。张强试图弱化女性在职场的贡献，将女同事描绘成靠性吸引力获取向上流动的人。

在单位里面，如果遇到一个好色的领导，在某种条件下，你是个男的，你就没有机会，因为女的会更有机会一些，如果说她再漂亮一些惹人喜欢，或者说敢于献身一些，那她机会就多了，这在我们身边的例子有很多。（张强）

### 5.2.2 工作、娱乐和家庭冲突

在“施虐男性”这一群体中，工作、工作压力和亲密关系的冲突纠结在一起相当明显，赌博、娱乐活动、工作变迁也会带来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变化。在工作中，这组受访者更多提到娱乐活动，他们强调这些娱乐活动对于工作和挣钱的益处。大多数人都有喝酒、打牌、赌博或找小姐的经历。他们倾向于缩小这些行为的负面影响并合理化这些行为。孙明认为，他们不应该因此受到批评，因为这对男性而言“很正常”。找小姐在他们看来并非是对妻子的欺骗与不忠，因为“在特殊情况下，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张强）。工作、娱乐与亲密关系中的张力又纠结在一起：工作成为他们花钱娱乐的借口，他们甚至会指责妻子不理解他们：

我这个工作接触社会、接触人多，可能有一些异性朋友打电话什么的，但是妻子就是心眼小，猜疑心非常大，她都要质问你半天。你怎么认识她的？她找你什么事？怎么怎么着的。（陈白）



与上述态度相一致，受访者普遍认为男性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有花钱的权利。在中国，赌博特别是打麻将非常流行。通过打麻将的例子，王喜解释了收入、赌博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你挣得钱多，赌大一点也没有关系。要是挣不到钱的人，输几万块钱，夫妻之间就总会吵架。吵得热闹的时候，就会离婚。（王喜）

家庭成员的工作变动有时也是导致冲突的导火索，因为工作变动带来了亲密关系中收入和权力的变化。这一群体对于工作变动更为敏感，当权力关系发生变动，经济和工作相关的变动有可能引发暴力。在本章开始，我们叙述了何顺的例子，说明了职业问题如何影响了个体生活和家庭冲突。尤其是，当男性失去工作机会，他们通常认为这是自己作为顶梁柱男性角色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在家庭内外的挫败感和压力感。

### 5.3 受虐妇女

访谈期间，有6人为体力工作者、农民、自主创业者和服务工作者，她们换工作非常频繁。另有3人从事白领工作，此外，最年长的被访者冬梅目前已退休。女性被访者的工作经历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男性被访者，有很强的性别差异的特征，这与社会如何看待和评价男女两性的工作密切相关。

#### 5.3.1 走上工作岗位

对于女性被访者而言，家庭责任常常是她们开始工作的原因，这常常以她们牺牲自己的教育作为代价。由于家庭贫困，3名年龄较大的被访者还未成年就开始参加工作，有的下地干活，有的外出打工。秀丽12岁时为了得到食品厂的工作谎报了年龄，而香儿和海兰退学之后便在自家田地干活。访谈发现，被访者第一份工作主要受家庭因素影响，家庭常为女儿们选择职业发展的道路。例如，蜥蜴说，“第一份工作是家里给我安排的，去做英文编辑。”

同时，追求经济独立的想法进一步激发被访者参与工作，以证明自身的能力。香儿说道，怀孕期间不指望经济上依赖丈夫家，她决定自己做

点小买卖，赚钱买点好吃的补充营养。另外，离婚也是直接激发女性工作的原因，如英子在第一次离婚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开始打工、做买卖。

#### 5.3.2 性别歧视下的努力工作

几乎所有女性被访者都表示愿意努力工作，来证明她们同样能够胜任男性的工作。例如，冬梅的工作管着全厂的1200多职工；桂华抬石头，参与建设大坝；秀丽修路、挖水沟、盖大楼。她们在工作中不认输、不退缩，海兰就认为自己是争强好胜的人，即便在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中，绝不受欺负。

一些被访者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她们的工作成就得到了认可。例如，海兰提到她之所以喜欢工作，是因为她足够自信有能力比别人挣更多的工资。同时，许多人强调工作给她们带来了快乐，也赋予了她们一些权力。冬梅对自己教书和做工人期间的成就表达了认可。独立的经济能力增强了她们在家庭关系中的权力和地位，如桂华有足够的养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这增强了她对婚姻的自主选择权。

在工作中，女性被访者有时也遭遇了性别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其中4人表示曾在工作中遭遇性骚扰。秀丽这样说道：

他让你上办公室里，说你多美，多好看……反正就说着不着调的话，这手一开始拍拍你，拍着拍着，手就乱摸，从肩膀上手往下滑。（秀丽）

面对性骚扰，秀丽认为“辞职是最直接的办法”。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她们倾向于采取回避策略应对性骚扰，尽量避免与骚扰者发生正面冲突。有时她们甚至选择忍受，如金星提到，“为了这份工作、为了生活，有的时候也得忍着”。此外，多数工作单位都没有上报、投诉性骚扰案件的官方渠道和处理方案，这无疑增加了女性应对这一问题的难度。

#### 5.3.3 “肩负双重负担的铁姑娘”

在被访者中，尤其是年龄较大的被访者，往往要在家庭内外的“双重负担”中挣扎，家庭责

任也常常会影响她们的工作表现。

女的就是不值钱啊，国家让我们妇女解放都参加工作，实际上家里面那点事减了吗？做饭不做吗？养孩子不养吗？我看一点也没解放。负担倒是增加了一倍，外头那点钱还得挣，家里这点活也不能少。（冬梅）

冬梅指出家庭内外的双重压力给予了她很大的压力，这让她不得不质疑中国是否实现了妇女解放。

让我们妇女解放都参加工作，实际上负担一点没减轻，做饭能不做吗？孩子能不养吗？我看一点也没解放。负担倒是增加了一倍，家里家外的活都不能少。（冬梅）

有一半的被访者在工作方面与丈夫发生了矛盾或冲突。工作中表现较好的妻子，有时会遭遇丈夫的贬低、挑剔，有的丈夫甚至憎恨妻子外出工作。例如，慧霞提到，她的丈夫总是想方设法阻挠她外出工作。秀丽指出丈夫一点都不认可她的工作，为此她经常和丈夫发生冲突。而蜥蜴因无法长期忍受丈夫的打击和贬低，决定去西安创业，却遭到丈夫的反对和阻挠。

## 5.4 讨论

对比三组受访者，工作的意义在他们的生命故事中差异很大。“性别平等男”十分认同自己的工作，谈论他们工作的热情、动机、奉献和满足感，希望把世界改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然而，有时候他们的理想遇到家人不支持、低收入、性别刻板印象和制度限制的阻碍，因此给他们带来了压力和挫折。值得注意的是，对工作的理解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男性的形象一脉相承，正如Louie（2002）所建议，从工作中形成的知识和个人素养营造了“成功”形象和建构了男性气质。

另一方面，“施虐男性”很少谈及工作中的满足感，工作只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不涉及使命和激情。然而，这一群体的男性也认为男性的成功是要通过工作场域的成功来定义的，主要评判标准是挣钱的多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群体中，工作和暴力是相互联系的。当他们不能通过事业成功来建构自己的男性气质，会给他们带来失败感和挫折感，而针对亲密伴侣的暴力就成了他们

的出气阀。从访谈中，“施虐男性”很少对伴侣在工作上的成就给予认可，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自然的劳动分工关系。上述的挫折感也可以理解成为他们不能满足传统父权制社会对男性作为家庭供养者的角色的“传统”期望。另外，当他们工作成功顺利的时候，他们常常运用成功来合理化自己喝酒、赌博和找小姐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导致亲密关系中的冲突和张力，暴力再一次将工作和家庭生活相互纠结地联结起来。

与受虐妇女传统形象相反（Bachman 1994; Gelles and Straus 1987; Johnson 1995），被访女性展示了她们在工作是“铁娘子”，在家是“贤妻良母”的形象。她们努力平衡工作和私人生活，肩负双重负担，尽管有各种困难，例如丈夫的不支持、强势的男上司等。有时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因为丈夫嫉妒妻子在工作上的成就，因为她们对家庭主要供养者的男性气质提出挑战。最重要的是，许多女性受访者在相当大程度上认同自己的职业成就。年纪较大的受访者如冬梅从工作中增加勇气来反抗家庭暴力。许多年轻的受访者试图把工作成就与亲密关系结合起来，虽然仍然有实质性的冲突存在，但是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比那些年纪较大的受访者更加平等。相反地，那些童年因父母阻碍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并参与过多家务劳动的受访者在成年以后，特别容易成为严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这一研究展现了妇女参与工作对家庭生活和伴侣关系的复杂影响。经济上的独立有利于妇女提升沟通的能力并离开有害的暴力关系。

# 第六章：亲密关系和性别暴力

第六章探讨亲密关系的本质以及三个群体关于性别暴力的经历和认知。这一章主要探讨三个群体的亲密关系、性别暴力以及他们的应对策略。

## 案例研究

### 性别平等男

罗成与研究生同学结婚，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相对平等、分享责任、建立了和谐的家庭环境。在家庭分工上，他做家务、抓大事、做决定，而妻子则负责做小事和对外交往。财务上，两人基本上独立，各花各的钱，但也有一些“公共资金”。因为他的空闲时间比妻子相对多一些，所以照顾孩子的时间也就多一些，而妻子下班后则给孩子讲故事。他们的主要矛盾来自对于孩子教育上的观点不一致，他认为妻子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过于严厉。他曾经打过妻子一个耳光，差点导致他们离婚。

### 施虐男性

由于家庭贫穷，王喜的父母做主让他娶了与一位家境富裕的女孩。因此，王喜对妻子没有很深的感情，觉得只要“人品不要太差就行了”。王喜平时喜欢赌博，他说赌博就像抽烟喝酒一样，上了瘾就戒不掉。他有点钱就天天打牌，一天下来会输几十块钱。他不喜欢妻子对他赌博的处理方式。只要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就会争吵，有时王喜会诉诸武力。最严重的一次，王喜把妻子打到头破血流，住院好几天。

### 受虐妇女

2004 年，41 岁的香儿经人介绍嫁到北京郊区。婚后同丈夫、婆婆、丈夫前妻的 18 岁儿子一起生活。2006 年，怀孕 3 个月时，丈夫对她首次实施肢体暴力。孩子 3 个月大时，丈夫开始向孩子施暴，暴力愈发频繁、严重。婆婆也经常挑拨离间、欺负、排挤她和孩子。香儿最开始出于离婚的羞耻感和给孩子完整家庭的考虑，始终容忍暴力。只有在遇到严重暴力时，她才会暂时性逃离，或寻求街坊邻居帮助。2008 年，她正式向法院申请离婚。

\*\*\*

该章分析的主题包括暴力的发生以及三个群体如何认知暴力和应对暴力。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来自施暴男群体的受访者都有婚姻经历，但访谈时，“性别平等男”群体的十个人中只有两个人已婚，其他八个人只有恋爱经历。这是因为这一组男性普遍比施暴男组年轻。所有的“施虐男性”和“受虐妇女”都分享了他们许多的暴力经历和应对策略，然而性别平等男组的故事则完全不同。

## 6.1 性别平等男

### 6.1.1 平等、合作的亲密关系

所有的性别平等男说他们选择妻子或女友都是出于爱情。有时，父母仍然干涉这些浪漫的关系，但总的来说，这些男性都会坚持自主选择。例如，仲泉最初来自河南省的一个农村地区，他与初恋女友的关系就遭到女友父母的反对。

刚开始她家人挺反对，就因为我的身高，她们家男性都很高，但是我比较矮。（仲泉）

大多数“性别平等男”都说自己与伴侣相处融洽，在日常生活中十分体贴，懂得照顾伴侣。当他们的伴侣同居的时候，常常承担家务活。例如，蒋航说：

谁有空的时候，谁就多做家务，如果大家都有空，大家一起做。我还是挺喜欢干家务活的，对家务这方面，没有什么可厌烦。（蒋航）

经济上，他们大多数都与伴侣平均分摊日常开支。然而，他们也认为在亲密关系中，作为一个男人经济上应该多承担一些经济负担，男人应该养家糊口的观念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例如，仲泉说：

我们没有平均承担，主要是我付的多的，有时女朋友也会付——我挣的多一些，没有严格的区分，但是毫无疑问，我付的多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嘛，男生嘛。（仲泉）

### 6.1.2 夫妻间的冲突

尽管两个已婚“性别平等男”——张浩和罗成在工作中倡导性别平等，但在家里与妻子的关系似乎并不完全平等。张浩常年在外工作，很少回家，而且对家庭没有经济贡献。张浩的妻子供养家庭，肩负工作和照顾孩子的双重负担。罗成与妻子分担家务活，且共享“公共资金”。两个人都报告有婚外性关系。张浩通过批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说：

婚姻制度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觉得两人的感情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喜欢彼此，我觉得其实不结婚也会在一起，即使你结了婚，你也不能把

两个人绑在一起，改变婚姻的本质。（张浩）

罗成也这样合理化并解释自己的行为：

我觉得我虽然有越轨行为，但我还是觉得，我好像没有负罪感，可能在性的忠诚方面，我有些自私，但是我觉得那种婚外性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她并不知道，所以也没影响到我跟她的感情，也不妨碍她的身体。（罗成）

他们也提及有时会与伴侣在小事上发生冲突。例如，张浩说：

有时候我们吵架，半年一次，大多数是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儿，例如屋子太乱、洗衣服等，她总是想让我做一些家务但是我没做——然后她就指责我。（张浩）

罗成曾经在岳母面前打了妻子一个耳光，差点导致他们离婚。他这样合理化自己的暴力行为，“不是很疼”、“我被她误解，好心当成驴肝肺”，他还强调“每一个人都有情绪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脾气归咎于儿时父亲的暴力的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

可能是我的脾气不好，我觉得我的个性遗传于我父亲。虽然我妹妹和我都不赞成父亲的暴力行为，但是我们的脾气也都不好。我觉得打人是错误的，也许她误会我说的话，我也误会她说的话了。（罗成）

罗成对自己的暴力行为感到后悔，这也许与他从事性别平等工作有关，他相信，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坚持非暴力准则。

## 6.2 男性施暴者

### 6.2.1 家庭权力关系

“施暴男性”家庭中的权力关系主要包括家务分工、家庭收入控制权和重大家庭支出的决定权，以及子女教育权。在家务分配方面，一些受访者认为女性应该承担所有家务。例如高飞说：“我的妻子没工作，家里的活都她做。”王虎说：“媳妇要是放假都是她做，有的时候她下班回来早也是她做饭。”其它受访者认为夫妻应该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王喜就告诉我们：

女的洗衣服更多，男的干重一点的活儿，挑



东西，挑水都是男的做，也不一定谁专门做什么。一般夫妻感情更好的，都会想彼此为对方多做一点。（王喜）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赚得比妻子多，但会让妻子管钱，他们这样解释道：“自己挣得多，挣的钱都给她”（孙明）。“钱她拿着，花的基本上都是我的”（陈白）。他们之所以把钱交给妻子，因为他们认为女性善于省钱。尽管女性能够控制金钱，她们仅仅是保管者，一般不能在家庭大额支出上独自做出决定。

## 6.2.2 暴力起因和暴力类型

我们通过受访者了解到，暴力起因有很多种。首先，最常见的就是说夫妻观点不一致，这种情况下，男性的观点更重要。第二，教育背景上的差异被用来解释暴力的原因。读了本科的杨子认为他的妻子“小学都没毕业，我说的话，她有可能听不懂。”第三，经济压力往往是引发严重冲突的导火索。第四，婚外恋普遍会导致家庭暴力，案例中陈白和何顺都因外遇导致暴力，最后离婚。第五，不良品质和生活习惯，如脾气暴躁、酗酒、玩麻将、赌博、找小姐等，都有可能引发暴力。高飞说：

有一次好像因为打麻将，我输了好几次，然后回家拿钱去玩。她特别生气，说都他妈给你得了，往那一摔，都给你输去吧。我就来气了，我说玩会儿咋了，上去给她两巴掌，平时也没时间玩去，那会儿确实揍她了，把她打趴在地上。（高飞）

大多“施虐男性”强调妻子的挑衅造成了暴力，暴力总是相互的，并非只有男性是施暴者。

有一次跟朋友在外面 KTV 唱歌，太晚了，然后她打电话，开始我没接，后来就接了，我就实话实说，她问有小姐吗？我说有啊，然后回来之后就打了一架，她打我，我拳脚相加，基本都是女人先动手。（张强）

对相互暴力的强调，表明他们不仅将责任归咎于妻子，同时合法化了他们自诩为“防御性”的暴力行为。然而，他们却无视了暴力带给妻子们的严重伤害。王喜描述了导致妻子住院的一次暴力事件：

多数时候我们打架是因为我没有完成她交代的家务活。有一次我因为打牌没干活，老婆就骂我，骂的我出火了，我就拿那个碗一抛，正好砸到她脑袋上，然后脑袋就割出血了。那个时候吓死了，赶紧弄了辆车把她送到医院里去。（王喜）

在暴力类型上，被访者报告的语言暴力远远多于肢体暴力。张强说：“吵架的频率很高，但打架总共没几次，就两三次。”高飞说：“吵两句就完了，那时候不是太动手，打架也不是那么频繁。”陈白的故事展示了语言暴力如何演化为肢体暴力：

有时候吵着吵着，她打了我一拳，我推她一下，或者拿着东西砸了她一下。（陈白）

除张强承认在婚姻中有过性强迫行为之外，大部分受访者回避谈论性生活，尤其是性强迫经历，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未能收集到强有力的资料。受访者中的李军和孙明两人，通过监狱被介绍到研究中，他们因为谋杀女友或妻子被判无期徒刑。在叙述中，他们没有什么负罪感和自责。醉酒后施暴并杀害年轻妻子的李军认为，自己仅仅是不走运，“没想到一棍子就直接打死了”。孙明酗酒后杀害了同居女友，并把她埋起来企图掩盖罪行，他认为判无期徒刑太不值了。

## 6.2.3 应对暴力策略

为了解决夫妻关系中的问题，一些受访者通常承认错误，向妻子道歉、说好话来寻求对方原谅。正如王喜所说：

我就只能天天和她说好的，就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故意拿碗打你，等于是无意的。然后不要让她做饭，给她添饭吃，慢慢的看我对她这么好，她的心也慢慢放下了。（王喜）

一些受访者表示说他们并非真心道歉，这仅仅是解决暴力问题的一个策略。

女人比较弱势，有的时候她不会先跟你承认错误，她的错，她也不会先跟你承认错误，得你先跟她说话，然后说那我的错你也得让着我点，就得这样哄她。（杨子）

有时候其他人也会帮忙调解暴力，特别是“严重暴力”发生后，包括父母、公婆、兄弟姐妹、邻居、

朋友、同事等在内的“亲朋好友”就会介入调解。

最厉害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闷着，很长时间不说话……有些朋友或者同事就会劝一劝。（杨子）

一些受访者表示不希望父母知道家里发生暴力，他们也不想让“家庭矛盾公开”（牛军）。对于妻子向外界寻求帮助，他们表现得不以为然。张强说：“媳妇给她哥哥打过电话，想寻求帮助，我就觉得挺好笑，那么远怎么帮的了？”

## 6.3 受虐妇女

### 6.3.1 暴力类型

从暴力类型来看，所有被访者都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包括肢体暴力、语言暴力、心理虐待及性暴力。多数被访者的暴力经历呈现出较明显的“周期性”，即经历甜蜜期、矛盾激化期、冲突爆发期、施暴者道歉的循环周期。实施肢体暴力有时借助“武器”，常常是厨房用品，容易导致重伤。

他拿个擀面杖啪一下子扔过来，扔我脸上，把我嘴打豁了，砸一个窟窿，我就直接上医院了。（秀丽）

他打了我两个多小时，把我打的动弹不了……俩耳朵都穿孔了，那会儿都听不着啥，脑子嗡嗡直响……后来就去了医院。（英子）

被访者中有三人明确提到在怀孕期间遭遇了来自丈夫的肢体暴力。香儿回忆说，“当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他打得我鼻血直流，眼圈黑的，脸都是肿的”。心理虐待和情感虐待往往会包括各式各样的行为，香儿的案例就非常典型。

结婚第三天，他一说就是，“你走、你滚、你回家、回你们家！”……我婆婆每天都把饭藏起来，不让我吃……结婚以后很长时间，他们都不给我家里的钥匙……他们甚至不让我生孩子……他们家的大事，都是他们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在他们家就是不存在的，就跟那个租房的似的。（香儿）

情感虐待几乎发生在所有被访女性的家庭中，其中金星的案例非常典型，她的经历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冷暴力”：她和丈夫很长时间都不

说话，假装对方不存在，给人感觉特别冷漠。

我们俩谁也不想低头，谁也不想先跟谁说话，就同在屋檐下，视对方如空气，这种也挺烦的。（金星）

被访女性中有七人遭遇了性强迫和婚内强奸，冬梅讲述，

我就说他是婚内强奸犯，他根本不征求你同意，你来例假，你做月子，他从来不放你，我还做过三个人工流产呢，他就是个畜生，从来不考虑你的感受。（冬梅）

有些被访女性指出性暴力与肢体暴力经常相互作用，正如冬梅所说“有时候他想，但是我不想，为这个就吵架，他就打我让我服从”。英子说道：“我也不喜欢他，跟他做那种事心里肯定也是特别难受，不是享受，那就是一种受罪”。被访者中有七人讲述，她们在婚姻生活中从未主动提出性要求，而她们的丈夫却又是男性强权主义者，认为自己可以占有妻子的身体，控制性生活。例如，每当秀丽试图回避性生活时，她丈夫总会说：“你是我老婆，我要你干什么的？这是合法的，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

### 6.3.2 权力斗争和日常冲突

与“施虐男性”叙述相似，女性被访者也认为，引发冲突的原因主要包括丈夫酗酒、赌博、找小姐，以及经济压力。仅有两名被访女性在经济上依赖丈夫，其他八人均经济独立。香儿和慧霞的丈夫都不外出工作，没有收入，依靠妻子赚钱养家。秀丽丈夫的工资虽然高于她，但是他总留着自己花，不管家庭的日常花销和育儿费用，把沉重的财政负担丢给妻子。秀丽提到她有很强的家庭观念，为了照顾公婆和孩子，甘于忍受丈夫的自私行为。

她们指出夫妻之间的互动和双方性格特征也会导致严重的紧张和分歧。女性被访者特别强调脾气暴躁、猜疑嫉妒、价值观的差异、感情缺失以及矛盾积聚都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原因。女性被访者对权力的争夺以及抵抗丈夫的需求，也加剧了家庭暴力和冲突。如蜥蜴的丈夫很大男子主义，总是控制她，为此她展开了顽强抵抗。

他需要我、需要他、依赖他、全心全意爱着他、服从他，可是这些条件我都做不到。（蜥蜴）

秀丽的丈夫喝醉后往往会有暴力行为，当她反抗时，暴力就会加剧。

### 6.3.3 暴力应对策略

有三名女性受访者长期停留在暴力关系中：桂华、慧霞、秀丽在分居或离婚之前，分别在暴力关系中生活了36年、14年和11年。对于为什么甘心停留在暴力关系中，她们给出了一系列解释。桂华认为她应该“包容丈夫，希望他有一天能回心转意”。慧霞的生活条件不能够养活自己。而秀丽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要努力维持家庭、减少冲突，给孩子创造一个完整的家庭环境。

出走和离婚是受访者摆脱暴力关系的两个重要途径。有些女性选择离家出走的方式暂时摆脱暴力，她们通常会“回娘家”。慧霞为了应对持续的家庭暴力，先是寻求派出所的帮助，然后离家出去北京。其他受访者认为离婚通常是终止暴力、摆脱暴力关系的必要措施。对于年长的女性受访者而言，离婚是一种耻辱，她们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下定决心离婚。而在年轻的受访者看来，追求幸福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她们能更容易做出离婚决定，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离婚变得越来越普遍。

我离婚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真的不开心，即便是有孩子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障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蜥蜴）

尽管如此，对子女的考虑以及遭遇亲戚的阻挠，有时也会成为阻碍她们下决心离婚的重要因素。丈夫施加的心理压力，以及对婚姻抱有期望，同样会影响她们做出离婚决定。一些受访者曾考虑用极端的方式结束暴力，如自杀或杀死丈夫。

有时候我真想杀了他，但是我不能那么做，我要是把他还捅了，我也得不了好，我得受法律制裁，儿女在家怎么办。（桂华）

为了应对暴力，女性受访者通常会主动寻求非正式系统和正式系统的帮助。例如，蜥蜴充分发挥朋友圈优势，找到学法律的同学帮她处理离

婚事宜。桂华向年长的女性亲属寻求支持和帮助。而正式系统援助主体包括丈夫的单位、妇联、派出所、法院等。像蜥蜴这样的年轻受访者，也会主动寻求心理治疗。这些措施有时能够减少丈夫实施肢体暴力，但有些时候，女性受访者在求助过程中也会被忽视，一些公共机构甚至维护施暴者，无法提供有效帮助。

法院拿我不一视同仁，他（指一名工作人员）说你再不马上回去，你老头子知道了更得打你。（桂华）

## 6.4 讨论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暴力存在的广泛性，包括语言暴力、情绪暴力、性暴力以及身体暴力。“施虐男性”和“受虐妇女”关于性暴力的访谈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大多数施暴男回避讨论性生活，因此他们忽视在性上是否强迫妻子的问题，但有七个女性受访者告诉我们，她们遭遇过性强迫和婚内强奸。

此外，丈夫的家人在暴力关系中明显扮演重要角色。如果与公婆关系相处不好，尤其是婆婆可能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帮凶和始作俑者。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对子女教育的分歧以及拥挤的居住环境都被受访者认为是婆媳冲突的原因。

许多“施虐男性”通过归因伴侣挑衅或者“脾气不好”来否认或者合理化他们对伴侣的暴力行为。这些否认策略可能与父权制合理化针对妇女的暴力的观念相关。“性别平等男”很少运用这样的策略。妇女在遭受暴力后，倾向于自我反省，原谅丈夫的行为，或者虽然认为丈夫的行为不对，但接受现实认为自己“命不好”或“运气不好”。非正式和正式的外部支持有时可以缓和或者阻止男性的暴力行为。然而，通常这种方式是无效的，受虐妇女常谈及她们遇到没有性别意识、不理解家庭暴力的法官和医生。离婚常常成为摆脱家庭暴力的唯一方式。

总而言之，有三个因素有助于区分我们受访者的家庭暴力经历。首先，受访者如何看待家庭暴力直接影响暴力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呈现。因

此，对于大多数接受访谈的施暴男来说，对亲密关系的暴力已经成为常态而不是意外。同样地，尤其是在年纪较大的受访女性中，家庭暴力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理所当然一部分，所以他人要做出有意义的干预会比较困难。相反，“性别平等男”很清晰地表明了家庭内对暴力的不容忍的态度。即便有少量暴力发生，通常是意外事件，往往都伴随着较为严重的后果。

其次，外部支持系统的无效和失能也进一步导致了“施虐男性”暴力行为的常规化，因为他们很少面临阻力和惩罚的威胁。这与王向贤等（2013）的定量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只有 7% 的妇女在经历了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后会报警，其中，只有 1% 的案例，警察真正干预了。面对这样的模式，女性施暴者在反抗或者离开施暴者时，会面临艰难的抉择，因为她们很少会得到外界的支持。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男性会长时间实施暴力，而女性会长期停留在暴力关系中。

再次，当讨论到暴力时，男性受访者采取的叙述策略似乎为它们自身的行为提供了最有力的解释。纵观受访者，“性别平等男”常常把家庭暴力视为不能接受和不可接纳的。非暴力和性别平等成为他们自我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违背这一价值观，针对伴侣采用暴力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个人损伤，也会质疑他们的自我认同。相反地，“施虐男性”的表述把表面上对暴力的谴责与他们对亲密伴侣的暴力的否认与合理化相结合。对这些男性而言，家庭暴力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他们所接受、容忍或者忽略，因为并没有威胁到他们的自我认同。



# 第七章：社会性别规范与暴力应对的社区话语

第七章探索关于受访者生活情境中的社会性别规范、性别期待和应对暴力、社区话语。该章分析的主题包括：如何看待性别平等，什么是理想的男性、女性和家庭、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和看法。

## 案例研究

### 性别平等男

仲泉出生于河南省的一个农村地区，这个地区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和重男轻女的观念。他在读硕士期间，跟随导师在一个农村地区做性别平等项目，这个地区离他家乡很近，也是一个重男轻女观念很强的地方。通过修改村规民约作为切入点，他和合作者们十分艰辛地在农村社会中推行性别平等观念。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他相信性别平等观念是提高和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一个有效工具。

### 施虐男性

在性别观念上，张强的立场很“传统”，他觉得男女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出生于暴力家庭的他，赞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在他看来，吸烟喝酒“对老爷们来说都很正常，对于女人来说就不正常了”。在性关系中，同样“应该由男人来主导”。张强认为着装举止比较开放的女人存在道德问题，“这种情况下被强奸，我只能送她两个字：活该。”张强在日常生活有过打老婆的经历，他觉得“当语言已经无法起作用的时候，就只有以拳脚相向了。”

### 受虐妇女

在 25 年的婚姻生活中，秀丽承受了来自丈夫各种形式的暴力。为了给孩子创造完整的家庭环境，她选择待在暴力关系中。她认为好男人应有事业心、责任感、绅士，好女人应是贤妻良母、体贴、包容、照顾男人面子，夫妻之间要互相尊敬、互相谅解。她对家庭暴力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她认为妻子有错可以成为受暴的合理原因，另一方面，她认为男性对女性施暴是一种犯罪，应通过社区调解、严厉的法律惩戒予以应对。

\*\*\*

上述案例表明，在中国社会和社区中，三个不同群体在性别关系和性别角色方面的观点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性别平等男”致力于通过努力工作，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促进两性关系平等。在“施虐男性”中，只有张强坦言“性别平等永远都不会实现”，其他人虽表示完全支持性别平等，但与此同时却时常攻击甚至暴力对待亲密伴侣。尽管遭遇了暴力，被访女性依然秉承传统的性别观念，矛盾地看待暴力。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下问题：“他们是如何看待性别平等的”，“他们是如何理解暴力的”，“他们如何看待理想男性、理想女性以及理想婚姻”。我们将分析不同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如何形塑了被访者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暴力经历，同时也将专门探讨社区话语对被访者性别观念的影响。

## 7.1 性别平等男

### 7.1.1 性别平等为人人

“性别平等”组中的受访者认为性别平等是一项国家政策，在中国已经实现部分的平等，但是还需要加强。仲泉认为“性别平等意味着向男女提供同样的机会和权利，要实现实质上的性别平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罗成认为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像毛泽东时代的“性别同化”，忽略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期待女性像男人一样行为举止、穿着工作。他们认为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仍然比男性低，所以希望努力改变这一现状。南龙说：

我觉得女性还是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当今社会男性在很多方面很有压力，比如买车买房，但是整体来说女性还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南龙）

总体而言，他们都强烈反对大男子主义。魏明说，“我理解的大男子主义就是甭管什么事情都以自我为核心，不尊重别人，不理解别人的想法，只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朱宇的理解与权力和控制有关，他说，“所谓的大男子主义就是特别要讲究男性的力量，他一定要通过控制你、要求你来彰显他的特权，当别人一旦不受控制的时候，他就发彪。”

### 7.1.2 好男人应该尊重女性

大多数“性别平等男”受访者都反对向女性施暴，但他们认为，言语暴力是很难避免的。例如，曹宏认为：

有时候说一些脏话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使用暴力的话，就完全不能接受了。（曹宏）

朱宇和张浩认为，采用家庭暴力反映施暴者的社会能力相对较低。他们还强调需要更好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来预防家庭暴力。例如，南龙认为“应该制定反家暴法，为受虐妇女提供更多的服务，让越来越多家暴受害者站出来，寻求帮助，我觉得这是必然要走的路。”他们还认为，性应该是两厢情愿的，不允许强迫性的性关系。朱宇告诉我们：

我觉得两个人发生性行为，一定是出于自愿的原则，结婚以后也应该是自愿的，不是说我结婚了，我就随便让你玩儿，女人又不是玩具。（朱宇）

“尊重女性”频繁地被受访者作为好男人的重要品质而引用，就如“上进心”和“保护家人的能力”一样。曹宏认为，“妻子的事业发展比丈夫好是一件好事”。罗成告诉我们一个好男人应该尊重妻子并照顾家人，他还特别强调夫妻之间需要互相理解和关心。

### 7.1.3 性别觉醒的根源

大多数“性别平等男”把家庭暴力看成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全社会的暴力现象和实践捆绑在一起。我们认为性别平等男的性别意识提升有三个主要来源：

1. 学生社团经历。一些“性别平等男”在大学期间有过学生社团的经历。他们被自己在学生社团中的经历所启发，并对社会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朱宇说：

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我曾作为志愿者参加了NGO的各种活动，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很好，十分感兴趣，自己也学到很多。（朱宇）

2. 社会运动。许多“性别平等男”都有各种社会运动经历，他们试图将社会性别的视角贯穿到他们的工作中去。例如，张浩解释到：

（我曾经参加过）曝光艾滋病村的活动，然后建立了艾滋孤儿学校，也包括说艾滋病家庭的贫困求助，还有再往后就是艾滋法律的项目等。（张浩）

3. 重要人物的影响。他们遇到的某些重要他人影响了他们的性别平等观念。例如，蒋雷解释说

在社会服务中心实习时的一个督导给了我很大帮助，包括一些社会方面的东西，各种知识或者技巧，但更重要的是，我被他激励了，这是我第一次完全把自己放开去向别人述说我的故事。（蒋雷）

由此可见，性别平等的信念是在与同辈和榜样的交流和互动中形成并建构了他们的性格，也源于接触更多非暴力与和平相关的信息。

## 7.2 施虐男性

### 7.2.1 性别平等：现实还是幻想？

超过一半的施暴男性受访者表示支持性别平等。例如，王喜说：

我认为应该是男女基本平等。重男轻女的人也有很多，在我看来，男的女的基本上平等，没有什么区别。（王喜）

支持性别平等的被访者认为，性别平等最重要的一条是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工作，这可能与毛主席时代所倡导的女性和男性都参加工作有关。王虎说：

家庭主妇是在浪费生命，当你闭眼睛的时候，应该考虑你得有点成就，不白活。男人女人都得有这样的想法。（王虎）

他们认为，性别平等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男女都应该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杨子解释道：

一个是社会上赋予的权利，另外一个家庭这方面的权利，就是说两个人应该有平等的权利，什么事互相商量。固定观念里就是男人是责任，但是现在女人也应该承担起一部分责任。（杨子）

在描述理想婚姻时，受访者认为夫妻“应该彼此信任，有共同的兴趣爱好”（陈白），“应该性格互补”（杨子），“能够互相包容”（高飞）。在描述理想男性的时候，受访者列出了如下品质：“有担当，能够担当起家庭的重任”（何顺）；“踏踏实实地做事，不在外面吃、喝、赌”（牛军）；“能够照顾妻子和家庭”（张强）。王虎对此有详细描述：

其实我不认为不打骂媳妇儿的一定是好男人。我觉得你得理解她，知道她什么时候需要你宽容，什么时候她想让你逗逗她，什么时候想上街了或者干什么，你得及时抽出时间多陪陪家人孩子，还得把父母、亲戚朋友的关系处好了。能做到这些就是一个好男人了。（王虎）

当受访者描述理想女性时，他们强调的品质包括：“温柔贤惠、勤俭持家，小鸟依人”（杨子）；“打扫房间、照料家庭”（孙明）和“为男人做饭”（王喜）。由此可见，施暴男性受访者虽然一方

面声称支持性别平等，另一方面却依然认可女性应该遵从传统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

### 7.2.2 知行不一

受访者对于暴力的态度和对性别平等的态度一样，都充满了矛盾。在理性层面上，他们清楚地知道暴力是社会所不允许的，应该避免。他们也知道暴力导致关系破裂、离婚等后果与损失。牛军的描述就非常生动：

既然在一起过，打架打坏了你得上医院治去，这些你不得花钱嘛。她把东西摔了，摔没了你还得花钱买。为这点事打仗，打完了还得过，那何苦打架呢，还是别打了，好好过日子得了。（牛军）

我们注意到，牛军对暴力后果的反思更多在于财务损失，而不是给妻子带来的身体和情感上的伤害。然而，一些受访者认为暴力是最后的手段。例如杨子说：“当实在没什么办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时就只能打了。”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他们缺乏解决问题的机制和情绪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基本行为假设是女性应该服从男性。

在“施虐男性”中存在着强烈的性双重标准。如几位受访者说道：“一般中国的女人在性方面都是被动的”（张强），“毕竟你是男的，你应该主动”（牛军）。与女性可以坦然分享遭遇性强迫不同的是，施暴男性倾向于强调女性的被动，以弱化自己的性强迫行为。这种性双重标准也体现在他们对于性骚扰的态度上，他们批评性骚扰是“不道德的”（何顺），是“对女性的不尊重”（陈白），认为性骚扰者是“失败者”（牛军）；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女性应该对所遭遇的性骚扰负责。

我觉得女人自重是一方面，另外一个穿着打扮这方面有一定关系，因为现在穿得都比较暴露，就容易被骚扰。（杨子）

## 7.3 受虐妇女

### 7.3.1 理想的男性和女性

当描述理想男性气质时，女性被访者提到最

多的关键词包括：顶梁柱、负责任、体贴、包容、绅士、英勇、安全感、稳重成熟、不暴力、尊重妻子、不嫖不赌等。理想的男人应该“外头是虎、回家是猫，不使用暴力，并尊重女性在家中的话语权”。幽默作为一项良好的社交技能，也被看做是理想男性的重要性格特征。对于大男子主义而言，被访女性的观点相互矛盾，一些人认为大男子主义霸道、暴力、专制，也有人认为大男子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不够爷们的气质，还有人给予了正面评价，认为其能够带来安全感。多数被访者认为大男子主义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事业成功的男性中更加明显。

在谈及理想的女性气质时，被访者通常认可女性贤妻良母的家庭责任和角色，以及温柔、内敛、体贴、包容、勤劳、大度的特质。她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女性不仅要打理好家务，还要在外面多赚钱，做到“里里外外一把手”。

好女人就是家里家外都是一把手，家里做饭什么的也做得挺棒，在外边又能挣钱，这才是事业成功的标志。（香儿）

很多被访者认为做家务和抚养子女是评判女性的最基本标准，与此同时，她们也非常强调女性需要独立，尤其认为经济独立是提升女性在家中地位的根本因素。她们同样强调女性要掌握财政大权，以防丈夫乱花钱。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更多女性通过有偿劳动摆脱了经济上的从属地位，赋予她们更多的自主权去应对暴力。

前些年不离婚，因为在那时候妇女就业率还是少，我们没办法只有忍受暴力，但是现在这妇女都能走出家门，都能自立自强，没有必要再受气。（秀丽）

对于性关系方面，多数女性被访者明确表示男性没有权力控制性关系。女性有权力拒绝丈夫提出的性要求，一方面出于生理原因，如处在生理期或孕期；另一方面出于情感原因，如冲突期间或心情不佳。金星明确提到“女性不是工具”，英子指出“这是两个人的事儿”。然而绝大多数被访者也信奉性的双重标准，她们认为男性的性需求是天生的，需要被满足。相反地，女性的性需求则是被动的，不需要太强烈。

我也得迎合他，因为他有这个需求，得满足他……男人的需求如果在家里得不到满足，就容易出轨。（慧霞）

### 7.3.2 “针对女性的暴力是犯罪”

女性被访者认为家庭暴力是一个普遍且严重的问题。她们认为家庭暴

力主要是男性的问题，针对女性的暴力是一种犯罪。她们反对家庭暴力，无论是在原生家庭还是婚后家庭中，都希望拥有和谐的家庭关系。

小的时候反正他们一打架，整个家里的氛围都不好，就不愿过那种生活，愿意去过一种平和的生活。你越打女的，肯定心离你越来越远，人虽然近，心却远了。（香儿）

冬梅、桂华、英子强调女性一定要辨别丈夫悔改的真实意愿，否则容易导致暴力的循环出现。桂华认为，如果丈夫屡教不改，那么就没有必要继续待在暴力关系中。针对施暴男性而言，被访女性普遍支持强化对其惩罚力度，并完善社区为基础的应对策略。

如果打人，就剥夺他一切权利，让他付出很大的代价，让他失去财产的权利。（秀丽）

然而，也有一些被访者认为家庭暴力和冲突在日常生活中很正常，并强调男女双方都有责任。因此，她们会采取谨慎措施应对暴力，也会注意妥善处理夫妻关系。

对女性被访者而言，应对家庭暴力的社会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倡导性别平等的公共运动、信息支持、社会服务、立法保护、妇联的法律和心理咨询，以及社区调解服务。

## 7.4 讨论

被访者认为，亟需建立有效的社区支持和可及的服务机构。大多数“性别平等男”认为，妇联等社区女性服务机构，很难有效地解决暴力问题。同样地，被访女性认为获得可靠帮助是应对暴力的长期且有效策略。来自社区、家庭成员的非正式支持有时会奏效，公共机构的帮助在一些



情况下虽然也会奏效，但是这类支持依然不够系统、有待完善。这突出表明他们将家庭暴力看作是综合性问题，需要社会资源共同干预解决。

“性别平等男”参与社会活动、加入学生组织等成长经历，似乎帮助他们形成了性别平等意识，脱离了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看到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相反，“施虐男性”普遍从生理差异解释性别关系，他们的叙述常常大而化之。尽管施“施虐男性”口头支持性别平等，但又解释由于两性之间存在生理差异，所以对妻子施暴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进而将自己的暴力行为合法化。

女性被访者却深刻意识到两性关系中的暴力本质，她们倾向于讲述自己的受害故事，并表明反对家庭暴力的态度。但是她们对于丈夫施暴的态度是复杂的，有的倾向于认可父权制推崇的“贤妻良母”女性角色。她们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似乎使得她们更难反抗家庭暴力，更难摆脱暴力关系。

城乡居住环境和社区生活的差异明显影响了被访者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农村地区更加强调父权主导的家庭关系，重视养儿防老，主张重男轻女。父权社会中“从夫居”和“嫁女儿”的文化习俗，也加剧了中国农村地区的性别不平等。而在城市社区中，父权制、从夫居、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观念都不甚明显。

最后，特定的公共政策和文化习俗也将带来性别不平等。例如，在某些特定的农村社区，如果第一胎是男孩，那么家庭便失去了生二胎的资格。相反，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那么政策将允许他们生育二胎。这样的生育政策迎合了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并在无形中暗示了男孩比女孩更有价值。在城市，女性退休年龄较男性早五年，就业市场中也存在歧视女大学生的现象。这些在公共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现象，很可能会强化家庭生活中的父权制。

## 第八章：总结和建议

### 8.1 总结

性别暴力贯穿着不同参与者的生命历史：从目睹父母之间的暴力、父母和老师实施的体罚、童年时的校园暴力到各种亲密伴侣暴力，性别暴力展现了不同的形式。

我们把男性受访者划分成两组，即“性别平等男”和“施虐男性”。在“性别平等男”这一群体中，暴力多为偶发的意外。在“施虐男性”这一群体中，暴力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实施的暴力包括不同程度的身体、言语、心理和性暴力。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会对伴侣造成严重伤害并需要住院治疗。所有女性受访者都是基于性别暴力的幸存者，侵犯者多半为丈夫或男朋友。

由于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城乡的生活差异，受访者的经历有显著区别。例如，歧视女孩对年纪较大的女性受访者影响严重，然而年轻的女性受访者相对拥有更大的自我发展的机会。同时，年轻的女性受访者比年纪较大的女性受访者遭受的暴力程度要轻微，她们也更敢于寻求帮助或者离婚。“性别平等男”大多数都在20岁左右，要比“施虐男性”更为年轻。同样，他们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成就的差别也更大。代际差异似乎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性别关系态度的变化，尤其可以反映出对亲密关系持更加平等态度的趋势。我们认为农村的家庭暴力比城市更加可见，然而，中国的城市地区家庭暴力也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只是因为城市生活的隐蔽性使得家庭暴力现象更不容易被发现。

在受访者生活中的暴力轨迹方面，男性受访者对童年暴力的心理反应似乎十分显著。尤其是“施虐男性”普遍使用否认策略来应对暴力的痛苦经历。例如，这些男性认为，暴力很正常，打是亲，骂是爱。由于否认或者合理化暴力，这些男性成年后更有可能成为施暴者，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攻击性态度或没有能力有效解决

亲密关系中的冲突。相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性别平等男”，虽在童年也目睹或遭遇暴力，他们明确选择拒绝暴力，努力做得比父母更好，并公开反对性别暴力。因此男性处理和应对自身受害的心理能力，也许与其成年处理家庭性别关系的能力密切相关。重要人物，如延伸家庭成员、老师、亲戚或者文化偶像有助于缓解家庭暴力，并帮助受访者提升性别平等意识。这一点在“性别平等男”的群体得到充分体现；相反，我们访谈的施暴男性和受虐农村女性的生活则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交孤立的特征。

童年的生活经历、上学经历以及后来的工作经历在塑造他们的性格、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和方式上具有重要作用，男性和女性都有能力去反思他们的经历并塑造他们未来的行为和经历。这在“性别平等男”和年轻的“受虐妇女”群体中表现最为明显。对于性别平等男来说，他们主动选择抛弃主流文化赞许的性别规范和价值观，构建多元的男性气质，并在私人和公众生活中建立起性别平等概念。对于年轻的女性被访者而言，她们对家庭暴力和自身权利有更好的理解，选择不忍受暴力，积极采取行动去应对暴力。相反，“施虐男性”相信男性对于女性的特权。他们倾向于把暴力合法化，证明暴力是“爱的表达”，否认家里性别偏好模式的存在，因此他们不能面对和矫正自身的暴力行为。

### 8.2 建议

本质性研究的结果支持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的定量报告建议，该定量报告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预防伙伴、北京林业大学、以及中国反家暴网络共同完成（王向贤等，2013）。这项深入的质性生活史资料为如何进一步预防针对女性的暴力提供了项目 and 政策建议，也为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提出建议。运用生命史时间轴，我们为预防针对女性的暴力提出相关项目干预和政策方面的建议，涉及到童年、学校、工作环境、以及亲密关系之间和社区范围等各个方面。



### 建议：建构健康的童年成长环境

该研究证实了家庭环境和与父母的关系是所有男孩和女孩性别社会化的重要构成要素。本研究发现，重男轻女的观念依旧存在，然而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本研究还发现，许多受访者童年目睹了父母之间的家庭暴力或遭受儿童虐待，这些经历都对他们成年后暴力观念和实践的带来影响。

#### 具体的项目干预和方法：

- 在中国建立一套积极亲子技能培训项目，促进父母双方的参与，提供沟通技能、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尊重孩子权益以及男孩女孩一视同仁等方面的培训。
- 围绕体罚对孩子成长的负面影响来开展意识宣传活动。
- 增强社会心理支持的可及性，为目睹父母暴力和遭受虐待的儿童提供咨询服务，尤其是在乡村地区。

#### 关键政策目标：

- 倡导父亲产假政策，鼓励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儿童抚养中来。
- 加强政策的实施力度，减轻重男轻女的观念。
- 建立更加综合性的健康部门，解决儿童虐待问题，促进医疗专业人士大范围加入识别和收集儿童虐待证据。

#### 进一步研究：

- 加强中国城乡地区儿童虐待，尤其是儿童性虐待方面的研究。

### 建议：推动学校性别平等项目的运行

本研究发现由老师实施的体罚、校园暴力、学生辍学等现象在受访者对校园生活的叙述中十分常见。研究发现，老师在学生的个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性别平等男”的经历表明，上大学或者大学社团组织的经历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意识的形成。

#### 具体的项目干预和方法：

- 将性别平等和权利的内容整合到各个年级的学校性教育课程，从而让学生尽早接触性别规范、性、性别关系、人权和性别暴力等概念并对相关主题并进行开放式交流。
- 在幼儿园和小学课堂里开展早期阅读和行动小组活动，讨论校园暴力，并在适当年龄阶段提倡非暴力观念。
- 为老师提供综合的培训，以便他们理解学生权利并建立非暴力课堂。
- 开展恋爱暴力和校园暴力干预项目。
- 在大学校园里，为倡导性别平等和宣传反基于性别暴力运动的学生社团提供更大的经济和技术支持。

#### 关键政策目标：

- 教育部应该努力支持平等的教育机会，在学校里加强暴力预防措施。

#### 进一步研究：

- 促进校园暴力与恋爱暴力的进一步研究。

### 建议：倡导健康和互相尊重的亲密伴侣关系

该研究发现，亲密伴侣关系的本质会造成暴力要么被容忍或正常化，要么被拒绝并避免。受访者也受到童年目睹的亲密关系暴力的影响，如父母、祖父母等。因此，发展和促进健康的亲密关系十分重要。

#### 具体的项目干预和方法：

- 促进对年轻人的有效干预，从而挑战有害的或者不相互尊重的关系模式，进而建立基于互相尊重，有效沟通和非暴力解决问题途径的沟通和社交技能。
- 为遭遇暴力的妇女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系统，尤其是法律援助、互助组织、热线电话、庇护所以及医疗保健。
- 在社区内开展预防和干预——尤其是婆媳之间，促进支持型的代际关系的形成。

### 关键政策目标：

- 建立和加强法律实施和司法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家庭暴力和针对妇女的暴力。
- 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从国家层面来解决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问题。
- 促进公共场所和工作场反性骚扰的倡导和政策制定。

### 进一步研究：

- 进行中国暴力预防项目的效度研究。
- 进行同性亲密关系中暴力本质和范围开展研究。

### 建议：倡导平等、和谐和尊重女性的男性气质

本研究发现男性气质观念和性别角色是由工作环境和社区环境所塑造的。改变性别规范和性别刻板印象是大家共同促进公平、公正社会的长远目标。

### 具体的项目干预和方法：

- 采用多媒体倡导和宣传来促进非暴力男性气质，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和农村社区里。
- 在社区里建立邻居互助体系，从而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事件。
- 设计文化敏感的社区项目以便挑战性别主义的文化观念、习俗和传统。

## 参考文献

- Atkinson, R. (1998). *The Life Story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Sage.
- Bachman, R. (1994).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report* (p. 2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 Bertaux, D. (Ed.). (1981). *Biography and Society: The Life History Approa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everly Hills: Sage.
- Brownell, S. & Wasserstrom, J.N. (eds.) 2002. *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n, K. L. (2009).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in Chinese societies. *Trauma Violence Abuse*, 10(1), 69-85.
- Chan, K.L., Tiwari, A., Fong, D.Y., Leung, W.C., Brownridge, D.A. & Ho, P.C. (2009). 'Correlates of in-law conflict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Chinese pregnant women in Hong Kong'. *J Interpers Violence*, 24(1), 97-110.
- Chao, R. K., & Sue, S. (1996). Chinese parental influence and their children's school success: A paradox in the literature on parenting styles. *Growing up the Chinese way: Chinese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93-120.
- Charmaz, K. C. (2006).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London: SAGE.
- Connell, R. (1987). *Gender and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onnell, R. (1998). 'Masculinities and Globalizati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1(1), 3-23.
- Connell, R. (1995/2005). *Masculinities* (2nd edition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onnell, R. (2000). *The Men and The Boys*.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 Connell, R. (2002).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onnell, R. (2005). 'Change among the Gatekeepers: Men, Masculinitie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the Global Arena'. *Signs*, 30(3), 1801-1825.
- Deng, L., & Wang, J. (2004). Analysis on the Restriction Factors of the Existing and Development of NGO in China [J]. *Sociological Research*, 2, 008.
- Duncan, O. D., & Hodge, R. W. (1963).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 a Regression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9-644.
- ECOSOC Humanitarian Affairs Segment. (2006). *Address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the role of the UN and its Member States* (Vol. . — ||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the role of the UN and its Member States || [www.un.org/docs/ecosoc/meetings/2006/docs/Presentation%20Mr.%20Michel.pdf](http://www.un.org/docs/ecosoc/meetings/2006/docs/Presentation%20Mr.%20Michel.pdf) ): [www.un.org/docs/ecosoc/meetings/2006/docs/Presentation%20Mr.%20Michel.pdf](http://www.un.org/docs/ecosoc/meetings/2006/docs/Presentation%20Mr.%20Michel.pdf).

- Evans, H. (1997).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n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vans, H. (2008). Gender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e. In K. Loui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Culture* (pp. 68-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rrer, J. C. (2002).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ng, V. L. (2002).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Urban Daughte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4), 1098-1109.
- Gelles, R. J., & Straus, M. (1987). *The violent home*.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Glew, G. M., Fan, M. Y., Katon, W., Rivara, F. P., & Kernic, M. A. (2005). Bullying,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elementary school.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159(11), 1026.
- Gutmann, M. (1996). *The Meanings of Macho: Being a Man in Mexico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mmersley, M. & Traianou, A. (2012). *Eth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Controversies and Contexts*. London: SAGE.
- Hausman, R., Tyson, L. D., & Zahidi, S. (2011).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1.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 Heise, L. (2011). *What works to prevent partner violence?*. London: DFID.
- Jin, Y. (2006) Iron Lady Reconsider: Gender and Labour in China Cultural Revolution (*Tieniangzizaisikao: zhongguowenhua dagemingqijian de shehuixingbieyulaodong*). Sociological Studies (*shehuixueyanjiu*), Vol 1. 169-193.
- Liu, X. (2002). *Otherness of Self: A Genealogy of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Johnson, M. P. (1995). Patriarchal terrorism and common couple violence: Two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83-294.
- Kleinman, A., Yan, Y., Jun, J., Lee, S., Zhang, E., Pan, T., Wu, F. & Guo, J. (eds.) (2011).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ouie, K. (2002).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uie, K., & Low, M. (Eds.). (2003). *Asian Masculinities: The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manhood in China and Japan*. London: Routledge.
- Lü, P., & Zhu, B. (2011). *Report on Anti-Domestic Violence Actions in China. Bei 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Chinese Sociology Press*.
- Manning, K. E. (2006). Making a Great Leap Forwar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Maoist China. *Gender & History*, 18(3), 574-593.
- Meara, E. R., Richards, S., & Cutler, D. M. (2008). The gap gets bigger: changes in mortality and life expectancy,

by education, 1981–2000. *Health Affairs*, 27(2), 350–360.

Miller, T., Birch, M., Mauthner, M. & Jessop, J. (2002). *Ethic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Milwertz, C. (2003). Activism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olence Against Women*, 9(6), 630–654

Mirandé, A. (1997). *Hombres y Machos: Masculinity and Latino Culture*. Boulder: Westview.

Mirowsky, J., & Ross, C. E. (2003). *Education, social status, and health*. Aldine de Gruyter.

Oakley, A. (1974). *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Olweus, D. (1997). Bully/victim problems in school: Facts and interven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2(4), 495–510.

O'Toole, L. L., Schiffman, J., & Kiter Edwards, M. L. (Eds.). (2007). *Gender Violenc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arish, W. L., Wang, T., Laumann, E. O., Pan, S., & Luo, Y. (2004).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China: National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Associated Health Problems.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30(4), 174–181.

Roberts, B. (2002). *Biographical Research*.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Rubin, G.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ited by Reiter, 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57–210.

Sanders, J. (2005). Gender and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 research review. *Seattle: Center for Gender Equity. Bibliography retrieved March, 20, 2006.*

Seginer, R. (1983).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 literature review.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1982-), 1–23.

Smith, P. K., Morita, Y. E., Junger-Tas, J. E., Olweus, D. E., Catalano, R. F., & Slee, P. E. (1999). *The nature of school bullying: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Taylor & Frances/Routledge.

Strauss, A.,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housand Oaks: Sage.

Tang, C. S. K., Cheung, F. M. C., Chen, R., & Sun, X. (2002). Defini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Comparative Study in Chinese Societies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7(6), 671–688. doi: 10.1177/0886260502017006005

Tang, C. S.K., Wong, D., & Cheung, F. M.C. (2002).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omen as Legitimate Victims of Violence in Chinese Societi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8(8), 968–996.

Taylor, L. C., Hinton, I. D., & Wilson, M. N. (1995). Parental influence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African-American student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4(3), 293–302.

Tsui, M., & Rich, L. (2002). The only child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girls in urban China. *Gender and society*, 74–92.

Wang, X. & Nehring, D. (in press) Individualisation as an Ambition: Mapping the Dating Landscape in Beijing, Modern China.



Wang, Z. (2005). "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31(3), 519-551.

Wang, Z. (2010). Creating a Socialist Feminist Cultural Front: Women of China (1949–1966), *The China Quarterly*, 204

Whiting, S. H. (1991). The politics of NGO development in China.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2), 16-48.

Zhao, G. M. (2003). Trafficking of women for marriage in China: Policy and practice. *Criminal Justice*, 3(1), 83–102.

Zhao, X. (2004).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NGO in Dealing with the Government: An Initial Research [J]. *Open Times*, 6, 002.

Zuo, J. & Bian, Y. (2001). Gendered Resources,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Perceived Fairness—A Case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 (November): 1122–1133

Zuo, J. (2005) Women's liberation and Gender Responsibility Equality in 1950s: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of Married Couples in Urban China (20 shiji 50 niandaifunvjiefang he nannuyiwupingdeng: zhongguochengshifuqi de Li Jingli he ganshou), Society (Shehui), Vol 1.